

# 新视界

## NEW VISION

### 学术讲堂

霸权的印象管理 ..... P1

### 学术论文

对称性对手与非对称性同盟展望 ..... P9

### 国关人物

法里德·扎卡利亚 ..... P20

### 他山之石

国际关系中的批判方法：技术，工具和行为的政治 ..... P26

### 新春特辑

..... P45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 编者的话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刊不同。挥别了 2014，迎来了 2015。《新视界》2015 年的新刊物已经展现在大家面前：新的内容，新的期待，新的感受。不过总有一些东西是不新的。不新，是因为不能轻易更改，不新，也是因为需要恒守。但是不管怎样，编辑部全体同学对系刊倾注的这份心血是不变的。

本期《新视界》依然有着精彩的内容：蒲晓宇博士在访谈中谈及印象管理和地位信号的概念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应用，以及美国政府在此方面的具体做法；冯得心同学以中日地缘争端和美日同盟为例解释了对称性对手和非对称型同盟概念；本期国关人物法里德·扎卡利亚是一位传奇的记者和专栏作家，我们将从他的生平、专栏和节目走进这位国关大师；“他山之石”为我们介绍了国际关系中的批判方法……

在本期的“新春特辑”中，我们为大家预测了 2015 年的国际热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学长学姐的经验之谈，更有老师同学对大家的新年寄语。希望大家能够在新一年的开始，对新学期有一个明确的规划。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更是充满希望的季节，希望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力争上游，不负这大好的时光。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转眼之间，《新视界》编辑部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而我也在新视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在新视界这个大家庭里，收获了朋友，学到了知识。一年又一年，铁打的“新视界”，流水的“兵”，不变的是一届又一届把大学生活奉献给新视界的我们。感谢从新视界成立至今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院系老师和各位读者，更重要的是为新视界勤勤恳恳付出的编辑部成员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继续一起奋斗，一起努力，克服困难，守护我们共同的结晶《新视界》！

最后，希望各位读者能继续支持我们的刊物，也欢迎各位的批评和建议，我们会及时改正，把新视界越办越好！

程康

2015 年 3 月



## 新视界

###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主办



2015年春季号  
【总第21期】  
2015.03 出刊

主编：刘芮宁

副主编：刘 志

本期执行主编：程 康

编辑部成员：

程 康 董柞壮 高振华  
胡阳阳 姜忆楠 江昊宇  
缴懿鑫 李 漩 李安琪  
李冰莹 李 萌 李天翼  
李志宇 刘 志 宁鹏举  
裴 瑶 唐铭兴 王 燕  
杨 雪 杨至远 姚丽丽  
于凯玥 赵姝婧

实习生：

丁敏潇 郭 超 马 刚  
彭宁楠 宋一宁 赵天畅  
许译丹

封面设计：程 康 刘芮宁

# 目录

编者的话..... (1)

## 学术讲堂

霸权的印象管理.....蒲晓宇 (1)

## 学术论文

对称性对手与非对称同盟展望.....冯得心 (9)

## 时事观察

2015：普京的日程.....孙 超 (17)

## 国关人物

法里德·扎卡利亚..... (20)

## 他山之石

国际关系中的批判方法

.....克劳迪娅·阿拉道 杰夫·于斯曼斯 (26)

## 英采飞扬

转变思想，赢得和平.....许译丹 (40)

全球化和区域化.....刘长松 (43)

## 新春特辑

2015 国际热点预测..... (45)

经验之谈..... (48)

## 目录

新书架（一） .....	（55）
院系活动	
学术交流 .....	（58）
校外短讯 .....	（59）
国际关系科研简报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	（62）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	（64）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	（71）
读编往来 .....	（79）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	（81）
征稿启事 .....	（87）

##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2010年6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组、新闻组和网宣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 霸权的印象管理

## ——地位信号与美国大战略辩论

**【编者按】**美国公众和学术精英对于美国近年来外交政策调整的态度不一，应如何解读？印象管理和地位信号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概念如何运用到国际政治的分析之中？围绕着本国的大战略，美国又是如何管理其霸权印象的？……蒲晓宇博士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与南开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主讲：蒲晓宇

时间：2014年12月31日

地点：范孙楼

**主讲人简介：**蒲晓宇博士，内华达大学助理教授，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博士后，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南开大学学士、硕士。主要学术领域：中国政治与外交、新兴国家、国际关系。

今天我谈的主题是：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与美国大战略辩论。关于霸权的印象管理，最近我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了一篇中文文章，对这个话题本身我也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和探讨。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观察体会，供大家参考。我准备讨论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介绍一下美国公众和学术精英如何讨论美国最近的这种外交政策上的调整或困境；第二，讨论美国霸权不同的理论视角是什么；第三，讨论两个概念——印象管理和地位信号，以及这些概念如何运用到国际政治分析之中；并以“亚太再平衡”为例，讨论美国如何管理其霸权印象，最后做几点小结。

### 一、美国公众和学术精英对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态度

最近美国外交基本一团糟，这里有美国的一些民意调查，包括对奥巴马总统处理外

交事务的看法，对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巴以冲突等等的满意度，基本都是百分之五十以下。美国外交政策这么多麻烦，对奥巴马总统这么多批评，这种批评算是一种客观的批评吗？换个总统会做得更好吗？或者怎么解释美国外交的困境？

#### 1.民意调查

我们看一下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核心问题——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继续扮演一个有领导力的角色，还是实行战略收缩？芝加哥外交委员会每年做一个关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的民意调查，美国是应该继续承担积极的角色，还是置身事外(stay out)？从1947年到2014年，认为美国要置身事外的数据一直比较低，但是最近算比较高。到2014年，有41%的美国民众说“我们干脆置身事外吧”，但是认为美国应扮演积极角色的一直还是高于50%，最低点也是58%。这就说明，至少从美国民意看来，美国对继

续在国际舞台上担任非常积极的领导角色有一种疲倦的感觉，但也不一定理解为美国要实施孤立主义。从民意反应来说，对美国自身的国际领导角色有一些调整。但是总体来说，美国主流的民意对于美国是不是要在国际上担任强有力地领导者，支持的还是占大多数，这是基本稳定的。

那么美国在世界的领导角色，从美国自己的民意调查来看，有什么变化呢？具体来讲，是更重要了、更不重要了还是差不多呢？数据表明越来越少的人认为美国角色越来越重要，只有 21% 的人认为美国角色在上升，大部分的人认为美国角色在下降——48%。

还有一个调查是关于美国是否受到世界舆论的尊重，参与者是美国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没有受到尊重。这里要区分一下，“国际地位”与“受尊重”还是有区别的，有权力有地位未必等于有尊重。从这里看来美国民意对美国外交上至少有一些反思。

## 2. 学术精英

我们来看美国的精英，也就是在学术上重要的战略家，他们怎么看美国的角色和地位。一个重要的辩论题目是，是否要实施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波森（Barry Posen）是 MIT 的著名教授，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写了一本书叫《Restraint》，该书认为美国大战略要实施一种自我限制。有代表性的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波森（Barry Posen）、沃尔特（Stephen Walt）这些资深学者，大部分有现实主义理论色彩的，他们认为美国要实施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说到这里，我感觉我们国关界对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有时候理解不够准确。虽然他的

理论翻译成“进攻性现实主义”没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主张国家大战略设计总要谋求进攻和扩张。实际上，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要维持其唯一的区域霸主的地位，但他反对美国过多介入到全球事务当中，反对美国用武力去干涉一些人道主义危机等。所以米尔斯海默对于美国实施全球性的霸权战略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批评。总之，这一批现实主义学者认为美国要实施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

还有一批学者在讨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时的观点更极端一些。他们认为整个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正在终结，因此美国不仅需要在战略上，而且需要在策略上实施收缩和调整。这些学者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斯维勒教授（Randall Schweller），美利坚大学教授、现任国际研究协会的主席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

另一派认为美国不必实施战略收缩，而应实施战略微调。他们针对前一段时间美国兴起的实施战略收缩提出了批评和反对，认为美国主导下的单极秩序还是基本稳定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要继续担任一种领导角色。还有一些学者，比如卡根（Robert Kagan），他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没有终结，美国实行全球领导战略对美国是有利的。这一派的观点仍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一派在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还包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等。

以上关于美国大战略辩论的核心是：美国的霸权地位或领导地位（leadership）是否可持续，美国维持霸权体系的成本和收益又是什么。成本包括安全和政治上的风险，比



如说从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来推演,从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推演,均势(balance of power)是稳定的,那么维护一个霸权体系,总会有其他大国潜在制衡的一种风险。成本还包括经济负担,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等是否值得?收益就是有利于维持一种国际秩序。美国既是维持这一秩序的世界警察,又是这一秩序的获益者。美国维持军事的主导地位是否有一种经济上的收益,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 二、不同理论视角下的霸权研究

回过头来,如何从理论视角看霸权本身。在中文里面,霸权通常指实际控制别国的行为模式,常常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上有一种贬义。但在英文文献中,霸权是一个相对中立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所处的超群的优势地位和能力。我们分析霸权的行为模式,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分析的概念,不管它政治上是贬义还是中立,主要是分析它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有哪些行为规律。

霸权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关于美国霸权有哪些理论视角?第一个就是实力基础,如果我们研究霸权兴衰来关注实力的此消彼长,会发现任何一个霸权体系与他的硬实力是紧密相关的。第二是霸权的维持机制。任何一个霸权体系不是只有硬实力的。用军事的手段、国际机制的手段,还是意识形态等其他办法来维持其霸权。第三个就是抗争行为与霸权的相对衰落。我们观察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会发现霸权的兴衰不可避免;而且另一方面,有霸权就有反霸,有主导就有反主导的行为,所以研究霸权也要研究那些抗争行为。

## 三、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

### 1. 印象管理

我提出的分析视角叫印象管理。霸权的印象管理是研究美国霸权的一个新的视角,具体运用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即在国际秩序的变动中,美国如何管理其在国内外观众中的印象。霸权的印象管理,与它的物质实力,与如何维持霸权,都有密切的关系。霸权的印象管理这一视角不是对现有理论视角的超越或替代,而是一种补充。

下面我们看印象管理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印象管理来源于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人生如舞台,人人都是演员”。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把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一种微观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拟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他用莎士比亚的一个比喻来探讨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管理自己的印象。杰维斯(Robert Jervis)把戈夫曼在社会心理学中的理论引入国际政治中,他的博士论文是《国际政治中的印象逻辑》,讨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怎样塑造和管理自己的形象。这是印象管理理论的来源。

从一般的界定来说,印象管理作为社会互动的一种现象,它是人们试图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印象的过程。在英文文献中,印象管理对应两个英文单词——impression、management和image management、Impression是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常用的,而一般商业文献研究如何树立品牌用image。因为心理学探讨的是个人层面,讨论集体和公司的形象就用image。我自己的研究和学习虽然借鉴了社会心理

学 impression management 的一些概念,但我还是翻译成 image management。因为我探讨的是国家,这就像一个公司在管理自己的印象和品牌,跟个人有些区别。

## 2. 地位信号

我把印象管理和另一个概念联系起来——所谓的“地位信号”,信号就是传达有关特定形象的一个信息。给大家举一些例子说明什么叫印象管理。一个是“炫耀性消费”。古典经济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者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他讲美国早期的有闲阶层会买一些奢侈品,不是图实用,而是为了彰显社会地位。这种炫耀性消费就是一种地位信号。

还有一种现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印度调研时发现一种现象。印度农民穷得叮当响,但他们把女儿嫁进比较富裕阶层的家庭。他们借钱不是用来发展生产或创造更多的家庭财富,而是用于举办豪华婚礼。这也是为了彰显社会地位。

有的学者做类比,认为很多东亚的国家如韩国、中国办奥运会也有些“嫁女儿”的意思,有彰显地位的意识在里面。另一种炫耀性消费,不完全只是象征意义。好比一个年轻的律师买一辆好车,其实是促进一种有实力的印象,这也是一个地位信号。一个新兴国家造航母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意义,目的之一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大国形象。

还有一种地位信号不是体现在消费上。陈光标的风格就是高调捐款。在美国,做慈善事业是很普遍的。美国的富翁捐款可能上千万、上亿就写个支票,有人捐几百万名字都不留,但陈光标就要高调。有个词叫 Conspicuous Giving——炫耀性给予,非常高

调地赠予也是在彰显地位。以上的例子都是为了传递一种地位信号。

## 3. 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

我把这些概念引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当中。国家怎样彰显自己的地位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信号,也就是一个国家试图塑造或改变自我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将这种信息刻意地传递给国际和国内观众。

我简要地说一下,彰显地位有哪些策略?一是发动战争。最近勒博(Richard Lebow)的研究表明,历史上很多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是为了争夺地位和威望,不是争夺实际的领土。当然他的书争议非常大,但至少是一家之言。二是摆架势(posturing)。第三是策略性宣誓(spinning)中文讲好比“忽悠”。不是撒谎,而是强调一方面,不强调一方面,这是一种宣传策略。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赠予我已经讲了,此外,还有一种“构建和加入俱乐部”。地位本身有可能是一种俱乐部式的产品,加入一个有权力或有荣誉的小圈子,那么这个小圈子就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美国是一个霸权国,中国是一个新兴崛起大国。霸权国与新兴国家在展示自己地位的过程中是不完全一样的。我稍微归纳一下,美国作为霸权国,对自己的印象管理特别是对地位的管理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有什么区别呢?霸权国在印象管理中主要展示的是对现有地位的护持,不是争夺一个新的地位。我最近写的一些文章,我主张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叫 status seeking,就是争取一个什么地位。我觉得这个大体更适用于崛起国家。但是对于霸权国,他不是争取一个什么地位,他是发出关于自我定位的信号(status signal),是一种霸权护持,是一种

地位护持,而不是争夺一个新的地位。但就中美关系而言,由于不够自信的美国对于维持地位的强烈偏好,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新风险,或者说更大的风险,一会会讲到。

第二,霸权国发出的地位信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个与中国或其他新兴大国不一样。新兴大国可能有两面性的地位信号。一种是示强,展示你强硬、强大的一面;另外一种示弱,展示我很弱,我还是发展中国家。霸权国展示的地位是一致的。

第三,霸权国的印象管理面临多重观众的困境。有国内观众、有国际观众,国际观众又有不同类型的国际观众。还有一点我想强调,霸权国做印象管理,既有以基本事实为依据,也有做面子功夫的操作空间,也就是说你展示你的地位与你的硬实力不能偏差太远,也不可能偏差太远。换作美国来说,他的大战略、有关国际地位的讨论往往跟他硬实力的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 4.以“亚太再平衡”为例分析美国的霸权印象管理

我主张从地位信号的角度来思考“亚太再平衡”战略。当然,我知道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对“亚太再平衡”的争议非常大,包括它的动机是什么,它的效果是什么,是不是需要调整。我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只是提出一个分析的角度。

我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看成是一种认知之争,即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就主导权的认知展开某种观念和认知的竞争。那么奥巴马政府实际上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资源有限和战略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亚太再平衡”战略大的背景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情况。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自己对自己的国际地位也不确定,做这些事实际上是对自己地位的一种巩固和维护。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些最新的进展,它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当国务卿的时候她是最早推动提出这个概念,当然背后实际上是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实际操刀在做。但是希拉里时代强调的是在外交和军事上巩固美国在亚太的存在,调子比较强硬。这在中国国内的解读非常负面,认为美国是不是要重新制衡中国,要遏制中国等等。但是最近,在习奥北京会面之前,克里国务卿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发表的中美关系的演讲,谈到他对“亚太再平衡”的解读,就比较和缓。他强调的是中美就全球利益的合作,在亚太地区加强合作,而且强调加强经贸之间的合作。

我们大体可以说有两个版本的“亚太再平衡”,这跟其他霸权的印象管理一样,面临的其中一个难题是“多重观众”——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解读。就“亚太再平衡”而言有几类观众:中国、美国的亚太盟友,以及美国的国内观众。我们也可以认为欧洲盟友也是,但最主要的是这三类观众。

从信号传导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第一个动因是中国呢?在美国的一些决策精英看来,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官方、媒体、智库以及一些学者过高估计中国的上升速度和美国的衰落速度,美国对自我定位的焦虑感上升,所以美国需要做一些事情进行回应。这是美方的一种解读。比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2009年在

Washington Quarterly 上撰文指出,中国过高估计自身上升的速度,也过高估计美国的衰落速度,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不稳定,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今年春天我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时候,听到奈进一步提出这个观点,并且强调这是美方当时一个重要的焦虑和关注点。这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信号观众的重要原因。

第二类是美国的亚太盟友。在小布什时代,美国的一些东亚盟友就担心美忽视其在东亚的存在,对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有一种焦虑感。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它们的焦虑感增加,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因。

第三个动因是国内观众,就是美国的党派政治。这是我访谈美国的一些学者智库的观点。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教授是小布什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提到“亚太再平衡”做的很多事情在小布什时期其实已经做了,而奥巴马则有过度“兜售”这个战略的嫌疑,实际上就是党派政治的竞争。奥巴马政府的言下之意是“你们共和党政府搞不定东亚事务,而民主党则可以搞定”。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同的观众它的期待有时候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矛盾的。美国加强对盟友的安抚,有时候又增加了中国的焦虑——美国是不是想要制衡中国?

另一个核心难题我称之为“地位困境”(status dilemma)。我们常讲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安全困境的意思是一方寻求保障本国安全的努力导致对方也这样做,最终双方的安全反而都下降了。地位困境的前提是一国的基本安全是有所保障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看来,虽然中美之间有着众多的利益冲

突,但是它们并不威胁彼此的本土安全。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它们对彼此的安全并不构成直接重大的威胁。当然,台湾问题美国一直介入其中,这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总体上这一观点仍然成立。我们可以说安全困境并不是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地位问题。地位困境的意思是一方试图维持其相对位置的行为导致另一方产生某种反应,双方都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地位竞争,而双方的地位排序并未得以改变。这同安全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花费了很多的资源 and 代价,但是它们之间的地位排序并未得到改变。近年来,地位竞争变得更加重要,甚至有的时候更为激烈。

## 5.小结

现在我小结几句。一是,从印象管理的角度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超越物质实力和心理认知分析法的视角,比较全面地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现实主义关注物质实力,建构主义关注纯心理学。从我的角度说,印象管理既与物质实力紧密相关,同时也与社会心理因素紧密相关,把这两种视角综合起来考虑国际秩序的变迁,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第二个小结是,霸权国对于维护既有的国际地位有强烈的偏好。我们讨论中美关系时通常认为,一个过度自信、狂妄自大的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不好。例如小布什政府的前期,说中国是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中国关系当时压力特别大。

“9.11”之后改变了,如果没有“9.11”,中美关系可能会更糟糕,至少在小布什执政前期是这样的。另一方面,从“亚太再平衡”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另一个极端也可能导

致中美关系(有问题),一个过度不自信的美国对自己的地位拿不准,有时候也会导致反应过度的动作出来。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个是从社会心理学的前景理论。通常而言,你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去防止损失而不是争夺更多的可能的收益。美国是既有的霸权,对其现有的地位有极大的守成偏好,不惜冒险付出很大代价。还有一个是单极体系本身,大家熟悉沃尔兹的权力制衡理论认为,在两极和多级格局下,国与国之间的制衡行为不是一个多么大的冲击。在两极体系下进行制衡或在多极体系下进行平衡,不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国太大的恐慌。而在一个单极体系下,一个新兴国家如果采取某些制衡行为的话,往往会引起现有霸权也就是单极的霸权主导国的紧张,这与两极和多极体系下的情形不一样。中国最近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美国的一些评论很有意思。斯维勒教授早年提出单极体系下霸权的运行模式:单极体系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显得比较敏感,对于微小的挑战也会非常敏感,这与单极体系的特征有关。

最后我想说的是,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有竞争的性质。我们看中美关系,如果中美都要在地区扮演一个排他性的领导角色,那么双方关于地位的竞争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两国的精英和领导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着实难办但是需要面对。习主席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个从外交上没有什么问题,也说得漂亮。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官方学者对于这个的解读和美方不一样,这句话是很符合常理的,太平洋确实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中国的心态与

美国不一样,我们至少在这个区域都是平等的。但是美国认为太平洋是足够大,足以容纳两个大国,但是一直以来一直只有美国一个大国,而中国提出有两个大国,这是中方提出的挑战。正如“新型大国关系”,中方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要跟美国避免冲突搞好关系。而美方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解读则是五味杂陈。

总之,我认为对中美之间地位问题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题。中美未来关于地位的竞争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多理论、现实的问题值得探讨。

#### 四、教师寄语

最后我简单说几点体会。我想说咱们南开的学术底子还是非常好的,这一点并不是自夸,而是说南开读书的氛围还是比较浓厚,能够沉下心来读书是一个比较好的传统。

##### 1.需要培养跨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做学问,特别是在国际政治这个学科中,我的体会还有以下几条。首先我们不仅要关注国际政治本身,也尽量要有跨学科视野。我们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学生或学者,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的学生或学者。虽然我们的领域是国际政治,但是很多知识是相通的。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其实很多时候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领悟出许多道理。以前我在听温特(Alexander Wendt)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说不要仅仅阅读政治学或者国际政治的文献。有时候国际政治科学辩论地热火朝天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社会学、心理学中早已经得到了解决。如果你没有这种视野的话,那么会造成很多的浪费。我想首先需要的是跨学科的视野,尽量多读书,读杂一些。从我自身的经历而言,也是如此。

以前我和同学一起读书的时候，虽然专业是国际政治或者政治学，但是我们读的远远超过这个领域。

二是要有一种问题意识。我们虽然阅读了很多文献，但是你具体的研究，选择你的研究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现实关怀，而且需要学术意识，你的问题到底重不重要，这个本身就很重；另外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趣。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可能也是最难的标准。以前我在国外读博士的时候，温特教授跟我们说，他听过很多人做报告，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呢？他提出，不管你们写博士论文还是学术报告，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tell us something we don't already know! 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 puzzle，而不是重复文献本身。如果你做的工作是填补了文献上的一项空白，当然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但是不够有趣。有趣的问题是，常规理论怎么预测，我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解释。

## 2. 借鉴中需要注意不同学科的背景

虽然我强调研究中的跨学科视野，但需要避免的一种情况是简单的借鉴，为玩概念而玩概念，这样会引起国关学界的概念泛滥。一方面，我们需要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另一方面，借鉴的概念应该能够实质性地解决过

关学界中存在的问题，带来一种新的视角。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所借鉴的概念的适用性往往是有限的。国际政治的背景往往与经济学、心理学有所不同。我在平时的研究学习中比较关注政治心理学，但是我也并不是完全赞成纯心理学研究中的取向，很多时候它们过度强调心理的作用而忽视政治上的利益以及国内党派政治的作用等。总之就是需要兼顾不同学科的背景，在借鉴引用这些概念的时候，需要适当地修正、修改和微调它们的适用性，需要做一些思考。比如对地位的追求，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它是个人层次的。但是在讨论国家追求地位的时候，它是一种政治行为。有些时候它就同国内政治的合法性相关。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就特别注意引入政治学的背景以补充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大体就是这几点建议和看法。我今天就先讲这么多。谢谢！

参考文献：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34-49

[整理：刘志、王燕、杨雪、宋一宁]

[校对编辑：赵姝婧]

[责任编辑：王燕]

# 对称性对手与非对称性同盟展望

## ——中日地缘争端与美日同盟的互动

冯得心\*

**内容摘要:** 中日地缘争端主要原因在于对称性对手之间的实力差距拉大, 意图和利益的冲突和分析导致日本联合盟友美国对中国实施“威胁均衡”的遏制战略。这不但没有达到日本窃取钓鱼岛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战略目标, 反而加深了美日这对非对称性同盟内部的“同盟困境”。各方的战略误判都将导致局势的激化甚至失控, 管控冲突的范围和烈度是各方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地缘争端; 中日关系; 美日同盟

近年来, 钓鱼岛问题使中日两国地缘争端不断升级, 其牵涉范围和深度已经超越一般的领土争端, 演变为资源之争、国家意志之争以及遏制与崛起之间的地缘战略之争。同时,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进程中, 美日同盟得到转型与强化, 进一步加深了美日同盟在中日地缘争端中的战略存在。本文试图通过将中日两国在这场地缘争端中界定为对称性对手, 来分析中日地缘战略之争的原因、性质和行为。中日之间的矛盾来源和现实争端都离不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通过对美日非对称性同盟的强化和内部制约机制的研究, 探讨中日地缘争端与美日同盟内部的互动关系。

### 一、中日地缘争端的形成

面对综合国力日趋强大的中国, 日本国内经济依然萎靡不振, 国际政治地位没有突破, 军事力量严重受限, 安全利益不能得到自身的保障, 安全战略处处掣肘, 可以说日本陷入了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双重危机之中。2010年中国GDP规模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日实力对比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日本对中国的防范之心更强, 防卫对象直指“中国威胁”, 对华战略上采取了更为高调的姿态。2010年12月, 日本政府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指出, 中国军事动向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sup>①</sup>2011年3月,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首次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强调“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关心日益高涨, 日本国民意识到中国军事力量扩大对其安全保障产生莫大的影响, 对中国的安全保障动向愈加关心”。<sup>②</sup>2011年8月2日, 日本政府公布《日本2011年度防卫白皮书》, 强调中国以空军和海军为重点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在周围海域存在增强军事影响力的趋

\*冯得心, 男,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

① 《2010日本防卫计划大纲》, 日本防卫省, 2010年12月17日,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14年6月25日)。

②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1》, 日本防卫省, 2012年2月, [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CN\\_web\\_2011\\_A01.pdf](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CN_web_2011_A01.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14年6月25日)。

势，加之军费缺乏透明度，中国的军事动向“是令地区和国际社会忧虑的事项”。<sup>①</sup>2012年7月31日，日本政府公布《日本2012年度防卫白皮书》，称中国的动向是地区的担忧事项，强调实现日美“机动防卫合作”。<sup>②</sup>

2012年4月，日本计划购买钓鱼岛使其“国有化”，这种单方面破坏现状的行为引起了中国的极大不满和反弹，随即派遣海监船和军机对钓鱼岛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巡航，日本对此进行拦截和对峙。2013年1月25日，日本政府决定重新修订防卫计划大纲，认为中国不断侵犯日本领海领空，并在周边海域空域急速扩大侵犯活动。<sup>③</sup>2013年1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次施政演说之中认为：“外交政策的中心正在动摇，像被人抓住了弱点一样，对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不断侵犯，这是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危机。”<sup>④</sup>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范围涵盖钓鱼岛，日本随即表示强烈反对。2014年6月11日，中国军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了例行巡逻，遭到日本军机“异常接近”跟踪。<sup>⑤</sup>

中日之间的地缘争端愈演愈烈，并没有缓和的迹象，2014年5月3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没有达成双方的对话和协商，反而扩大了中国与美日的分歧。<sup>⑥</sup>可见，中日领土之争已经演变为资源之争、国家意志之争以及遏制与崛起之间的地缘战略之争，严重影响中日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也危害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二、制衡对称性对手的“威胁均衡”

巴里·布赞认为：在无政府结构内，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核结构和特性是有两种关系界定的：权力关系、友好和敌对关系。具体包含四个变量：边界、无政府结构、极性和社会性建构。<sup>⑦</sup>中日之间产生的地缘争端已经让彼此认知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接下来要对中日双方的物质力量进行评估，我们采用唐世平和龙世瑞的一个相对简洁有效的指标衡量：当一国GDP总量（total GDP，百万2005国际元）与该国人均GDP的积（2005国际元）是另一国两倍以上时，两国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如果在两倍以内时，两国关系是对称性的。

① 《日本2011年度防卫白皮书》，第74页，日本防卫省网站，2011年12月，[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1/12Part1\\_Chapter2\\_Sec3.pdf](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1/12Part1_Chapter2_Sec3.pdf)（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6月25日）。

② 《日本2012年度防卫白皮书》，2012年，日本防卫省网站，<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2/ebook/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6月25日）。

③ 《平成25年度の防衛力整備等について》，日本首相官邸网站，2013年1月15日，[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3/\\_icsFiles/afieldfile/2013/02/08/20130125boueiseibi.pdf](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3/_icsFiles/afieldfile/2013/02/08/20130125boueiseibi.pdf)（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6月25日）。

④ 《安倍首相 所信表明演説の全文》，日本经济新闻，2013年1月29日，<http://www.nikkei.com/>（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6月25日）。

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就日方炒作中日军机“异常接近”发表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2014年6月12日，[http://www.mod.gov.cn/affair/node\\_46261.htm](http://www.mod.gov.cn/affair/node_46261.htm)（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6月25日）。

⑥ 《香格里拉对话专题》，凤凰网，2014年5月30日，<http://v.ifeng.com/mil/special/xgllhd/>（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6月25日）。

⑦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2页。



①见表1:

表1: 中日实力对称性评估<sup>②</sup>

国家	日本		中国	
指标	GDP 总量 (百万 2005 国际元)	人均 GDP (2005 国际元)	GDP 总量 (百万 2005 国际元)	人均 GDP (2005 国际元)
2010 年	4025786.7711	31815.37	11504292.8406	8727.47
2011 年	3995686.8024	31587.16	12562687.7819	9485.90
2010 年 实力对比	日本 GDP 总量*人均 GDP/中国 GDP 总量*人均 GDP=1.28			
2011 年 实力对比	日本 GDP 总量*人均 GDP/中国 GDP 总量*人均 GDP=1.06			

由上表可见, 中日之间的物质实力对比尽管日本占有微小的优势, 但总体而言是对称性的, 并且 2011 年比照 2010 年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急剧缩小, 已经相差无几。这样的实力对比完全可以形成日本略占优势的权力平衡, 那为什么日本选择进攻性的行为导致中日之间的地缘争端升级呢? 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原因:

### (一) 两国发展速度的差距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军事的不断发展, 日本经济并未走出“迷失困境”, 两国经济总量不断被拉大, 加之“中国威胁论”的宣扬, 导致日本对中国越来越感到疑虑恐慌。

### (二) 打破国内和平宪法的制约

按照日本国内的和平宪法, 日本没有发动战争的权利, 只能发展用于自卫的军事力量, 并且每年军费增长的幅度不得超过 1%。而中国则在发展现代化军事能力的道路上加速前进, 海空军事力量与日俱增, 军事技术不断完备。日本愈加对中国在东海的行动感到威胁, 安倍上台以后不断要求修改宪法, 意图打破二战以来国内和平宪法的约束。

### (三) 中日利益和意图的不一致

对于中国而言, 钓鱼岛并不属于核心利益。在约瑟夫·奈与中国外长王毅的谈话中, 王毅表示钓鱼岛属于争议领土, 只是因为日方不断地挑衅, 中方才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应, 也欢迎与日本进行领土谈判。但对于日本而言, 安倍晋三一再表示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 不存在任何的争议, 是日本的核心利益。在意图方面, 日本意图通过挑起中日地缘争端来加强美日同盟, 突破国内和平宪法, 联合周边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共同遏制中国。

① 国际元是一种平衡各国货币在贸易中出现的货币价值差值的工具, 在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该指标适合考察国际冲突, 因为人均 GDP 大致可以衡量国家的技术水平 (石油国家除外), 并且易于操作。参见唐世平、龙世瑞: 《美国军事干涉主义: 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 年第 9 期, 第 84-111 页。

② 数据来源参见 The Penn World Table (PWT)8.0, <http://citaotest01.housing.rug.nl/FebPwt/Dmn/AgregateXs.mvc/PivotShow> (最后访问时间: 2014 年 6 月 25 日)。

中国意图捍卫领土主权完整，在这场地缘争端中，领土问题并不是全部意涵，其中对于日本右翼势力上升，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对二战的历史问题的隐瞒回避，导致两国之间存在国家意志之争，尤其在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基础上，更有能力也更有信心来应对日本的挑衅，东海丰富的资源，也是两国地缘争端的重要原因。

由此观之，日本虽然在总体物质力量上优于中国，但中日之间的差距缩小，军事实力和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导致日本对中国感到威胁。根据沃尔特的“威胁均衡理论”，“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sup>①</sup>所以，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不仅来自力量对比，还有进攻意图的判断。同盟不一定非要制衡实力最强的国家，而是制衡它们认为对自己最具威胁的国家作为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日本已经不能单独面对其所认知的竞争对手中国，必须寻求美日同盟的帮助，对中国进行“威胁均衡”。

### 三、非对称性同盟的“同盟困境”

美日同盟并非因中国而建立，而是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以应对朝鲜战争和冷战的结果。冷战后，美日同盟经过转型与强化，更加关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事实上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战略支点。同时，美日同盟并不是一个对称性的同盟，原因之一在于《美日安保条例》规定了美国对日本安全的义务，同时也给予美国在日本本土驻军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是一个“非正常国家”。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和平宪法的制约，另一方面源于美国驻军对日本的军事管控。原因之二在于美日的物质力量的不均衡，这是美日同盟的非对称性的根本，也是美日同盟维持的根本原因。美日物质力量对比，见表 2：

---

<sup>①</sup> Stephen Walt, *Origins of Alliances*, pp.21-28, and p.32.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cbFbAAAAQBAJ&pg=PA17&hl=zh-TW&source=gbs\\_toc\\_r&cad=3#v=onepage&q&f=false](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cbFbAAAAQBAJ&pg=PA17&hl=zh-TW&source=gbs_toc_r&cad=3#v=onepage&q&f=false)（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6月25日）。

表 2: 美日实力对称性评估<sup>①</sup>

国家	美国		日本	
	GDP 总量 (百万 2005 国际元)	人均 GDP (2005 国际元)	GDP 总量 (百万 2005 国际元)	人均 GDP (2005 国际元)
2010 年	12992000.0000	41857.84	4025786.7711	31815.37
2011 年	13225900.0000	42243.75	3995686.8024	31587.16
2010 年 实力对比	美国 GDP 总量*人均 GDP/日本 GDP 总量*人均 GDP=4.25			
2011 年 实力对比	美国 GDP 总量*人均 GDP/日本 GDP 总量*人均 GDP=4.43			

由上图可知,按照两倍以上即为非对称性关系的原则,美国与日本的力量相差悬殊,美日同盟属于非对称性同盟。有研究指出,“非对称性联盟中,如果防御性国家为强国而进攻性国家为弱国,则联盟很难存续”。但在考察美日同盟时,认为其“尽管存在一些裂痕,但是由于美国对盟友的强大控制力,使得美国对日本的制约比较轻松,联盟管理相对容易”。<sup>②</sup>尽管如此,由于中日地缘争端不断升级,美国倾向于防御性,而日本越来越倾向于进攻性的过程中,美日同盟不仅可以存续,甚至可能出现强化合作的行动,但“同盟困境”也在日益的加深。“同盟困境的概念”是由格伦·施耐德在 1984 年提出的,核心观点认为在联盟之中,A 国经常会害怕 B 国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背叛自己,这种“被抛弃”的担忧使得 B 国若想维持同盟必须采取行动取得 A 国的信任,同时又会担忧 A 国与他国的冲突会将自己引向战争,从而“被牵连”。为防止“被牵连”就需要和 A 国保持距离,甚至不过度介入其与他国的争端,这就又增大了 A 国对“被抛弃”的疑虑。国家在联盟中既不想“被抛弃”又不想“被牵连”,从而导致“被抛弃”和“被牵连”的风险同时存在的状态称为“同盟困境”。<sup>③</sup>美日之间的“同盟困境”主要体现在对中日地缘争端中的意图不一致。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否是个威胁对手尚存争论,美国对中国的关注重点在于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sup>④</sup>卜睿哲认为,尽管中国的全球角色和对外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但中美两国之间是“合作而非

① 数据来源参见: The Penn World Table (PWT)8.0, <http://citaotest01.housing.rug.nl/FebPwt/Dmn/AggregateXs.mvc/PivotShow> (最后访问时间: 2014 年 6 月 25 日)。

②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 年第 3 期,第 35-36 页。

③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4, No. 3, July 1984, pp. 461-495.

④ Scott L. Kastner,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2, Vol. 56, No. 1, pp.163-177. 转引自: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 2 期,第 26-67 页。

冲突”，<sup>①</sup>中美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中美应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sup>②</sup>美国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促进中国成为更好的国际社会成员是合理的，并且在多极化的世界中，中国是一支合法的地区力量。<sup>③</sup>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不会和平崛起，中国的战略意图在于控制亚洲，将美国赶出亚洲，而周边国家出于恐惧也会联合起来加入到美国领导的平衡联盟，来防控（check）中国的崛起，就像冷战时期英、德、法、日甚至中国加入到美国一边遏制（contain）苏联一样。<sup>④</sup>正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言：“中国在迅速崛起的同时，美国陷入了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使美国对中国的观点、行动及其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非常敏感，进而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sup>⑤</sup>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从未单一，而是根据现有策略和条约观察中国的行为，从而决定如何应对。这与日本在战略意图上从根本是不一致的，在日美同盟强化和转型的过程中，美国扮演同盟管理者的角色，一方面帮助日本维护其国家安全，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管控日本的意图和行为，维护二战之后的东亚地区秩序。

美国一再的安全保证减弱了日本“被抛弃”的顾虑，但日本在中日之争中的进攻性行为导致美国“被牵连”的几率上升。如果美国过分制约日本，会导致日本的不信任感上升，从而谋求发展成为正常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美日同盟内部的博弈策略，见表3：

表 3：美日同盟内部博弈策略

	美国	日本	结果
“被抛弃”	失去东亚地区的战略支点与合作伙伴。	安全受到威胁甚至利益损失，但有理由修改宪法，发展自身军事力量。	美国失利，日本相对得利。
“被牵连”	恶化同中国的关系，甚至冲突。	中日地缘争端中，日本是当事国。	美国失利，日本相对得利。

上图所示，在非对称同盟之中，防御性的美国无论是“被牵连”还是“被抛弃”都使得自身利益受损，而日本都是相对得利一方。所以在中日地缘争端之中，美日之间的“同盟困境”更加特殊，那么为何在中日地缘争端中美日同盟的互动导致强国利益受损？原因有二：

① 卜睿哲（Richard C. Bush）于 2008 年 11 月 17 日在陶森州立大学（Towson State University）的演讲，转引自：门洪华主编：《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65-177 页。  
 ②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02-518 页。另可参见：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http://www.mauldineconomics.com/images/uploads/overmyshoulder/The\\_Future\\_of\\_US-Chinese\\_Relations\\_Foreign\\_Affairs.pdf](http://www.mauldineconomics.com/images/uploads/overmyshoulder/The_Future_of_US-Chinese_Relations_Foreign_Affairs.pdf)（最后访问时间：2014 年 6 月 25 日）。  
 ③ Amitai Etzioni,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3, 2011, pp. 39-553.  
 ④ John Mearsheimer, “The Rise of China Will Not Be Peaceful at All,” *The Australian*, November 18, 2005.  
 ⑤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第 12 页。

### (一) 美国的过分介入

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之争的过分介入,客观上增加了地缘争端的激烈程度,导致地区局势更加紧张。美国历来对钓鱼岛的根本态度是“主权中立”,但“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美国的态度是主权争端应该以和平方式谈判协商解决。之前的声明大多语义含糊,并且声明发布者的行政级别较低。2010年钓鱼岛事件之后,美国高调介入钓鱼岛争端之中。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晤日本外相时表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内容,美国重视保护日本国民的义务。2013年1月20日,希拉里重申这一观点:钓鱼岛在日本的“施政”之下,反对任何单方面寻求破坏日本“施政权”的行为。2013年2月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重申“钓鱼岛在《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内,同时表达了希望两国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美方一贯立场。2014年4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日与日本首相安倍会谈时,表示钓鱼岛在内的所有日本管辖下的地区,均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共同防卫条款,此外对于早前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也表示支持,这两种表态在美国总统级别均属首次。不仅如此,美日同盟在军事方面也是动作频频,多次举行“夺岛演习”的联合军演,意在吓阻中国,同时安抚日本以减轻其“被抛弃”的担忧。

上述行为看似中立,事实上意在偏袒日本,这样日本就可以安心追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殊不知中日地缘争端愈演愈烈,已经存在超出美国控制和预见的可能。美国为追求其期待的“亚太平衡”与地区和平与稳定而付诸的高调偏袒的行为,反过来很可能既破坏“亚太平衡”又有损地区和平与稳定。

### (二) 日本战略误判

日本依仗美国一再的军事保障,不断采取进攻性行为,谋求从对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到拥有主权的转变,过分刺激中国,从而导致中日地缘争端和美日同盟困境。日本战略误判主要在于对美国安全保证的误判、对中国意图和意志的误判、对自身实力的误判。

首先,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是出于《美日安保条约》,是美国履行同盟义务的表现,意在安抚日本对“被威胁”、“被抛弃”的忧虑,保障同盟正常运作与强化合作。日本不但“拿鸡毛当令箭”,将其看做美国对日本与中国进行地缘争端的支持,不断挑起争端升级,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美日同盟都产生了损害。正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所言:“安倍政府对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存在误读”。<sup>①</sup>

其次,日本低估了中国的意图和意志,导致其不断渲染所受威胁和挑动事态升级。一方面,中国认为钓鱼岛主权归我,但作为一块争议领土是可以进行谈判协商来解决的。但日本坚持认为主权不存在争议,反而通过租借、购买等手段挑动地缘争端。另一方面,日本低估了中国的国家意志,从而期待通过压制手段迫使中国妥协,这只能引起中国更大的反弹,增加进一步采取手段的可能。

<sup>①</sup>《鸠山由纪夫: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不能带来和平》,新华网,2014年06月16日, <http://japan.people.com.cn/n/2014/0616/c35469-25152051.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6月25日)。

最后，日本高估了自身实力以及美日同盟的坚固性。中日物质力量对比中，中日实力分化愈加严重，中国的上升态势一方面让日本恐惧，另一方面却让日本试图以对称性对手的身份制衡中国，但日本毕竟受制于国内宪法和国际约束，自身实力受到严重限制。另外，美日同盟的强化是一个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愿意为日本埋下的一切恶果买单，当“被牵连”的风险和国家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美国必将在同盟框架内约束日本，毕竟维持日本的受限状态才是二战结束以后东亚体系所谓的“现状”。

#### 四、小结

本文通过界定中日地缘争端为对称性对手之间的争端，解释了为什么在权势均衡的状态下，日本选择进攻性的行为导致中日之间的地缘争端升级？原因在于两国发展速度的差距、打破国内和平宪法的制约、中日利益和意图的不一致。那么这样一来基于“威胁均衡”的相关理论，日本需要联合盟友-美国对中国进行“威胁均衡”。

由于中日地缘争端而实施“威胁均衡”的过程中，为何非对称性的美日同盟内部的互动导致强国利益受损？其一是美国过分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之中，增强了地区的紧张程度，反而与美国的战略目标适得其反。其二是日本对美国安全保证、中国意图和意志的误判及对自身实力都产生了误判，不仅达不到自身目的，反而容易受到制约和挫败。

中国作为这场地缘争端的当事国，一方面应该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另一方面应该管控冲突的范围和烈度，起到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大国作用。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同时与日本保持接触的渠道，争取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缓解紧张局势。

[责任编辑：姚丽丽]

[校对编辑：董柞壮]

## 2015: 普京的日程

孙超\*

对普京来说,没有哪一年比2014年更为煎熬。自2013年底的乌克兰亲欧盟示威(Euromaidan)爆发演变至乌政局动荡及局部内战,普京莫不殚精竭虑。从呼吁维护亚努科维奇治下的体制安全,强调俄乌1997年以来的友好关系,到为维护俄军事设施和俄族人安全而出兵进驻克里米亚,再到指责乌克兰新政府的“非法性”,普京成为乌克兰危机演进的重要人物。2014年3月18日,克里米亚独立并正式加入俄罗斯,普京一时难掩激动,“克里米亚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难道不正体现自由这高于一切的价值吗?理解理解我们吧。”在随后纪念卫国战争的59周年纪念日,普京将2014年解释为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各民族表达他们与俄罗斯同在的坚定信念”。对西方势力的强硬展现了普京作为大国领袖的气度,他的工作也赢得民众的坚定支持。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8月民意调查显示,普京的支持率达到了87%,成为自2008年八月战争以来的最高纪录。

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强硬表现更加凸显其民族主义和大国雄心。普京将西方针对俄国军事干预乌克兰局势的制裁视为“阻碍我们发展,将我们推向政治、经济和文化孤立之镜”的行动。为此,普京的经济顾问格拉济耶夫(Sergei Glazyev)宣称将抛售美元债券、离开美国市场作为对西方强加经济制裁的回应。制裁作为2014年俄与西方交往的关键议题,早就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欧盟的制裁随着俄国军事干预的持续而逐步加深:从威胁制裁逐步演进到针对经济体系的打击。尽管欧盟内部意见不一,但三个制裁脚本已经酝酿成型:弱式制裁即限制与俄军工有关的行业进出口;一般制裁禁止与俄军工部门和关键性经济部门的进出口,特别是天然气和石油;强式制裁则孤立俄罗斯,断绝正常交往。而美国集中于3点:1、限制本国企业公民同俄企业的经济联系;2、冻结部分俄国防、能源巨头和金融公司在美资产;3、对俄公民进行选择性的制裁。虽然西方承认制裁并不能解决俄乌政府间的冲突,但会对俄罗斯“军事入侵”起到威慑作用。

但让普京头疼的不是制裁,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油价下跌。财政收入50%以上受惠于油气出口的俄国,终究逃不过持续的油价下跌带来的猛烈冲击。长期维持在110美元/桶的乌拉尔原油,在8月中旬的一周跌破100美元/桶。根据路透社(Reuters)的计算,石油价格每降低1美元,俄罗斯联邦税收收入就降低140亿美元。俄罗斯分析家们大多认为油价下跌受到地缘政治而非产业本身的影响,页岩油只是昙花一现。但普京预期的油价上涨并未出现。至10月份底,全球油价跌破85美元/桶。美国与沙特联手布局,使用石油打压俄罗斯和伊朗初见成效。而普京的工作也越发艰难。石油价格的下跌将威胁到俄罗斯经济稳定和普京政权。不仅如此,通过石油兑换硬通货的俄石油企业,受经济制裁影响难以在资本市场上自由活动,也难以获得西方的技术设备以降低开采和运输成本,在运营上难以为继。

---

\* 作者简介:孙超,男,复旦大学2014级国际关系博士生。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突遭欧盟反垄断机构突击搜查，将面临高额罚款的风险。与之相对比的是，2014年美国的页岩油革命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石油产量，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并在不久的将来从石油净进口国发展为石油净出口国。全球能源革命带来的是能源地缘板块的急剧变动，俄罗斯毫无例外成为了受害者。

麻烦不止一个。2014年初索契冬奥会所树立起来的美好形象到2014年末完全变成另一个光景。2014年11月15日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布里斯班G20峰会中，西方政要在外交上边缘化普京。东道国甚至公开表示不欢迎普京。这让普京陷入矛盾，即通过国际会议进行沟通对话的理性期望与维护大国地位和尊严的现实诉求之矛盾。西方对普京的普遍不信任使普京难以通过灵活的外交手腕处理乌克兰危机和自身困境。普京所假设的通过强硬手腕迫使西方接受谈判的情境并未出现，而乌克兰危机也并未如他所设想的通过军事干预就能够迅速解决。

普京在布里斯班峰会的失意随着卢布危机爆发而越发沉重。12月1日，卢布经历1998年以来最大单日幅度下跌。同一时刻，普京在安卡拉宣布放弃正在建设南溪（South Stream）天然气管道。《纽约时报》撰稿人安德鲁·鲁斯（Andrew Roth）称南溪管道的废弃是普京罕见的“外交挫败”，也是欧盟与奥巴马在2014年少有的胜绩。“像俄罗斯那样货币大跌”的国际流行语成为俄罗斯2014年底的现实。12月15日，俄罗斯卢布崩溃，汇率跌幅创下1999年4月以来最高纪录。尽管俄央行采取紧急措施加息，16日卢布继续大幅度下跌，直至17日卢布汇率在克林姆林宫的努力下才有所反弹。卢布的崩溃并没有带来经济混乱，更没有给普京政府带来剧烈的冲击。恰恰相反，根据列瓦达中心11月份底的数据，至少80%的俄国公民信任普京，对其不抱期望的人从去年的12%降到现今的4%。与去年的30%的政府支持率相比，今年有46%的俄国人支持政府。俄国人对教会、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信任感也由此提高。普京式保守主义的民意基础在危机中有所扩大。

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将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精神激发到极致，也极大的影响了普京对当前全球秩序的霸主美国的认知。与其他金砖国家不同的是，莫斯科尝到了与西方较狠劲的苦楚，更是在经济、政治斗争上心力交瘁。长普京时代在2014年进入了拐点。精英们惴惴不安，俄国政治中新势力也在悄然成长。

进入2015年，普京的工作日程显得比去年繁忙。普京面临两大难题：第一，他必须妥善得处理对外关系，防止乌克兰危机、经济制裁和油价下跌进一步冲击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恢复俄罗斯的成长空间；第二，他需要维护好与民众和精英的关系。既不能让民众因为长期的经济颓势和外交上的可能让步对克里姆林宫产生信任危机，也不能让跟随他的精英群体在局势没有起色的前提下丢失忠诚。为此，普京的工作日程规整起来变得简单：1、乌克兰危机尽速解决，防止被其拖入泥潭。一月中旬，普京致信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建议乌双方尽速停火，并协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一道采取行动控制事态。26日，普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矿业大学发表演说，表示在乌南部



亲俄武装力量是“外籍军团”(foreign legion),并推测这是“北约军团”恶化局势。多数分析家认为这是普京在释放信号,希图美国直接参与到乌克兰内战停火局势的谈判中。但奥巴马已经表示美俄关系“重启”已不可能,美对乌的直接支持也越益明显。新冷战的硝烟似乎烧起,美国之锤准备钉死乌克兰楔子。俄欧对传统关系极度恶化的忧虑,使得明斯克会议再度召开。2月12日德法俄乌达成明斯克协议书,要求乌双方全面停火,撤离重武器。尽管15日乌克兰正式停火,但没有奥巴马的签名和乌混乱的局势使新协议难以为继。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还需牵扯普京更多精力。2、防止经济衰退演变为对普京体制的威胁,多管齐下稳定经济,强化民众信心。油价下跌和卢布危机对俄罗斯经济带来直接侵害。数月来,俄罗斯物价暴涨,恶性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在俄城市普遍出现。俄民众取空储蓄,囤积食品谷物和罐头以应对风险。少数民众对俄政府反衰退措施集中于银行和工业领域,而对零售业置之不顾感到不满,甚有表达对俄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的痛恨。但正如俄一公民所说,“政府资源现在非常有限,我不期待获得强力的支持”。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最新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68%俄民众认为俄罗斯有遭受入侵的风险,而49%的公民支持俄罗斯军队的当前作为。多数民众勒紧腰带支持普京的大国战略。而普京政府也在平抑物价和化解卢布危机上有所作为,并命令政府部门减薪10%,以维持民众的信任。3、化解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被杀带来的精英分裂危险,继续吸引精英的团结和支持。俄罗斯前第一副总理、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在莫斯科街头遭射杀,其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关切。一石激起千层浪,俄罗斯当前社会的人权和民主问题一时成为西方媒体的口诛笔伐的焦点,甚或恶化普京政权的国际形象。对秩序、传统和稳定强调甚多的普京及时做出回应,并着手调查。可想而知,普京政权不久一定会给予俄精英群体更多利好消息,以稳定政权。

俄罗斯的2015年不仅是2014麻烦的继续,也是考验自身实力的关键时刻。国际政治时钟能否转向欧亚时刻与普京的“治理技艺”密切相关。而普京的新一年工作也将更为辛苦,他的力量和决心则是克服国家风险的关键要素。可否顺利走过2015年,普京的俄罗斯坚守以待。

[责任编辑:杨至远]

## 法里德·扎卡利亚

**【编者按】**法里德·扎卡利亚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关系学者。作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大师塞缪尔·亨廷顿的学生，他的真正工作却是记者和专栏作家。本人并非大学教授，他的书却依然能够风靡全球，并成为国际关系学生的必读书目。本期《国关人物》，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从著作、节目与专栏三个方面，共同走近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印度裔美国人。

### 学者简介

法里德·扎卡利亚 (Fareed Zakaria)，美国著名印度裔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现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人气时评类节目《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 制片人及主持人，《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1964 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贵族家庭，在孟买的“大教堂和约翰卡农学校”(Cathedral and John Connon School) 毕业后，他在家族的支持下远赴美国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此后他于 1993 年在哈佛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1998 年，他撰写的《从财富到权力》(From Wealth to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广受好评，后翻译成几十个国家的语言版本，令他在海外声名大噪。而后他撰写《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W.W. Norton & Company, 2003) 一书，阐述和分析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未来的发展趋势。2008 年，他的《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 W.W. Norton & Company, 2008) 在全球热卖，书中详细分析了几个发展中国家在各个领域对当今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现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亦将此书作为他的随身读物。

扎卡利亚曾于 2002 年至 2007 年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人气节目《这一周》(This week) 中担当新闻评论员，亦于 2005 年至 2008 年在公共电视网 (PBS) 监制并主持财经类节目《法里德·扎卡利亚与外汇市场》(Foreign Exchange with Fareed Zakaria)。2008 年 6 月，他在 CNN 推出了人气节目《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该节目于美国东部时间周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1 点在 CNN 首播。

扎卡利亚于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参与了学校对美国外交的指导性研究课题，并于 1992 年成为《外交》(Foreign Affairs) 杂志主编。2000 年 10 月，他被邀请成为《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主要负责采访外交事务和撰写当周的外交评论文章。2010 年 8 月，被邀请为《时代周刊》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此外，他还曾经担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等报刊的专栏作家，撰写过大量得到政治界、经济界一致好评的评论文章，影响巨大。

## 一、著作

### (一)《从财富到权力》

法里德·扎卡利亚于1998年撰写了《从财富到权力》一书。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由于广受好评，因而被翻译成几十个国家的语言版本。该书使得扎卡利亚在国内、国际上都广受赞誉、名声大噪。

《从财富到权力》一书主要叙述、探讨了1865年至1908年这四十年间，美国由一个经济强国上升为一个世界大国并寻求向外扩张的过程。该书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并验证了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Government-central Realism Theory)。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讨论了防御型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和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第三、四、五章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并分析了美国在1865年至1889年、1889年至1908年这两个时间段内的对外扩张；第六章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归纳，该部分严格遵照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要求，从问题意识、理论假设和案例验证这三个方面总结了全书的主要内容<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国由经济强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这一过程来说，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提出的疑问是“美国为什么在19世纪末进行扩张”(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而在本书中，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提出的问题却是“美国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多一点进行世界扩张”(如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sup>②</sup>在本书中，作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有关知识，对1865年至1908年这一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作用方式和影响方式等进行了监测分析。作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何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没有将其强大的国家力量特别是经济力量转变为海外影响。同时作者认为，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是对一个新兴国家的外部行为进行分析、解释和预测的一种比较完整和完善的国际关系理论。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是《从财富到权力》一书着力介绍和解释的重要概念，是该书的理论主线。那么，什么是“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呢？扎卡利亚认为，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和防御型现实主义可以被视作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理论，但这两种现实主义理论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问题，因此，法里德·扎卡利亚批判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型现实主义，提出了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这一修正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当国家的核心决策者意识到政府力量的相对增长时，国家就会试图扩张其政治利益。<sup>③</sup>即在国家将自身增长的实力转变为对外扩张的海外利益的过程中，核心决策者有没有意识到政府力量的相对增长是最重要的干预变量。

① 周陶洙：《政府能力与大国崛起——评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115-128页。

② 张立平：《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一点看法——评法里德·扎卡利亚的新著〈从财富到权力〉》，《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147-150页。

③ 法里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一个国家如何成长为一个新兴大国?国家财富即经济力量应该如何、在什么样的时期内才能转变为海外影响力?在别的时期又为什么不能产生这样的转变?这些经典命题在《从财富到权力》一书中都得到了较好的解释。《从财富到权力》一书揭示了政府力量这一核心变量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将国内政治因素纳入到了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论建构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国际关系的新颖的视角。该书强调了国内政治这一单元层次变量的重要性,从而丰富并修正了现实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新兴国家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 (二)《后美国世界》

作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学生、《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CNN 节目主持人、《从财富到权力》的作者、一位有着全球影响力的资深媒体人的法里德·扎卡利亚,在美国是否已经衰落、如何维护美国霸权以及如何遏制美国的潜在对手等方面的争论中,其观点与其他美国政治家与国际关系学者相比,会有何不同呢?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扎卡利亚并没有花费过多的笔墨探讨美国是否衰落的问题,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其他国家的崛起过程上。作者在书中想要努力诠释的是: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巨大的转折,这一转折才是最值得今天的人们为之探讨的东西。这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正在走向强大,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及其所展现出的巨大发展潜力意味着世界将进入经济群雄并起的后美国时代。而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就是这个后美国时代最直接的表现,即一个新的世界即将产生。《后美国世界》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惯性看法,从全新的角度向读者诠释了在世界经济新秩序重整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点和机会将在哪里。在后美国时代,谁能为我们重画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蓝图?

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个视角上,对过去500年间世界权力中心的三次转移做了系统的总结。在这500年间,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是权力分配的根本性调整,都重新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第一次权力转移是西方世界的崛起,始于15世纪,到18世纪末期大大加快。它既创造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化——科学和技术、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也创造了西方国家长盛不衰的政治主导地位。第二次权力转移是美国的崛起,它发生在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实现工业化不久,就成为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并且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其他国家无论怎么联合也无法动摇它的地位。美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主导着全球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的优势无与伦比,这是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而今天,我们正经历着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权力转移,这次权力转移可以称之为“他者的崛起”。在经济上,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在快速增长,而且增长率之高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各国经济繁荣与萧条并存,但总体趋势无疑是上行的。最明显的增长发生在亚洲,但其他地区的崛起也不容小觑,比如在2006年与2007年,非

洲超过 2/3 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超过了 4%。从全球最大的炼油厂到世界排名第一的赌场，从一次次被刷新的高度到全球最大的摩天轮，从全球最大的制片商到最大的注册贸易公司，从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工厂到最大的金融业中心……以上种种都出现在美国国界之外。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殊的单极世界：开放的全球经济已经并且仍在快速扩张，而这种扩张正不断推动着国际秩序在本质上发生新的变化。

与国家崛起相伴的还有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不是只有国家才是决定自我命运的博弈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也在分享着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权力。在后美国时代中，组织和个人的能力增强了，等级制、集权化和控制力则正在遭受侵蚀。过去由政府独揽的一些职能，现在需要与国际机构共享，在所有国家、所有议题上，每天都有大量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参与进来。企业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以寻求最佳的经营地点，这使一些政府从中受益，也使另一些政府遭受损失。恐怖分子（如基地组织）、毒品卡特尔、叛乱分子和各种民兵组织，都可以在国际体系的角落和缝隙里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权力正在从民族国家向外转移，转移的方向既可能向上，也可能向下，也可能走向两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国家权力的传统行使方式，无论是经济权力的还是军事权力的，已经越来越不灵了。

由此可见，在政治上，“后美国世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更改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中，美国所能够做的，只不过是这个“一超多强”的世界图景中更大地保存自己的实力和话语权。如今，争取自身意志行动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了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一种限制；而中、印等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冲击也必将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已经发展到与美国的同等水平，而那一代的中国人自出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强国”的记忆，那时的中美关系将会是什么样的？那时的美国又将会如何看待与它实力均等的中国？这些问题更加值得我们为之思考。

## 二、节目

《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以下简称《公共广场》）是由法里德·扎卡利亚主持的一档关于国际焦点问题与外国事务的热播电视节目，于美国东部时间每周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1 点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播出。《公共广场》开播于 2008 年 6 月 1 日，至今已播出了 300 余集。

一般来说，《公共广场》是以由扎卡利亚主持的辩论展开的。节目会邀请 3 至 4 位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学者、作家、记者或官员来对时下国际关系领域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受邀的嘉宾基于其自身独特的政治态度、研究领域、宗教信仰等因素，对既定的议题会给出各自独到的观点，而扎卡利亚则以中立的角度引导他们进行有价值和有秩序的辩论，从而达到对议题的全面解析。例如在 2008 年 6 月 1 日开播的第一期中，扎卡利亚选取了“奥巴马狂热”（*Obamamania*）作为议题，邀请了 CNN 的首席国际记者克里斯汀·阿曼普

(Christiane Amanpour), 欧盟驻美国大使、爱尔兰前任首相约翰·布鲁顿(John Bruton), 全世界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的裴敏欣(Minxin Pei), 以及前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作为嘉宾。在讨论中, 扎卡利亚引导各位嘉宾从美国、中国、欧洲的地缘视角对“奥巴马狂热”提出了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分析, 并促使他们直接进行对话辩论, 从而对这一议题做出了深入的剖析与解读。此外, 在一些特定的片集中, 扎卡利亚还邀请了曾经的或现任的各国政要, 并对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采访, 邀请的对象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等。采访的内容则相对广泛, 从对其职业生涯的提问到对当时热点问题的看法的探究均有涉猎。

《公共广场》主题的辐射范围非常广, 全世界有价值的政治、经济领域的议题都会得到涉及。近期《公共广场》所关注的主要议题有: 乌克兰的危机及其背后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冲突、希腊债务危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缩写为IS) 杀害约旦飞行员事件、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的去世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影响、法国《查理周刊》遭袭事件及其引发的对欧洲穆斯林的思考与争议、备受争议的电影《采访》(*The Interview*, 又名《刺杀金正恩》)、卢布危机以及美国与古巴的关系等。此外, 在近期的《公共广场》中, 扎卡利亚还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夫妇进行了采访, 与他们讨论了时下的热点问题。

《公共广场》具有典型的美国政治节目的风格, 主持人风趣幽默, 但内容严肃认真, 并且视角相对中立客观, 是一档非常有价值的政治类时评节目。

### 三、专栏

作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 每周四, 法里德·扎卡利亚都会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是对当前热点问题的评价与思考, 少数时候则会关注一些相对“冷门”的话题。但不论话题本身的冷热与否, 扎卡利亚总会寻找到一些特别的角度, 对话题进行富有新意的解读。在文章中, 扎卡利亚引经据典, 自然地游走于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 往往通过个别的国际事件, 引出其对整个国际局势的思考, 体现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极具高度的国际眼光。阅读扎卡利亚的专栏文章, 总会使我们有所收获。

在2015年的第一篇专栏文章中, 扎卡利亚关注了美国正在面临的“创新困境”。扎卡利亚认为, 尽管在欧洲和亚洲, 人们总是赞扬美国的创新和创业精神, 但实际上, 美国的创新正在处于困境。“1978年, 新成立不到一年的初创公司占全美国公司总数的近15%; 但到了2011年, 这一比例已下滑至8%”。老牌公司往往更加趋向保守, 因此便会造成缺乏创新的恶性循环。此外, 缺乏对新技术的探索也是缺乏创新的重要原因。在扎卡利亚看来, 美国人并非生活在一个创新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崛起是多年投资结出的果实, 如今我们急于将创新的果实连核带种一起吃掉, 没人去为下一次技术革命松土灌溉。”

扎卡利亚还引用了硅谷的例子，来说明政府的投入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州之所以能汇聚这么多工程师，是因为美国国防工业巨头在当地吸引技术人才。许多点燃计算机革命火炬的传奇性初创公司——譬如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英特尔（Intel）等——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美国军方和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都一直采购这些公司的产品，直到它们足够低价化、平民化，能够适应更广阔的商业市场。”而如今，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已经越来越少，中国等国却正在奋起直追，正在比肩乃至超越美国。但扎卡利亚最后指出，以上的种种困难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无药可救，因为美国自身的最大优势便是不断地自我批评，美国人应该让这种自我批评成为自身继续创新的重要动力。

近期，扎卡利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法国《查理周刊》遭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及它们背后所体现出的国际恐怖主义身上。在1月8日的文章中，扎卡利亚借助《查理周刊》遭袭事件，指出在伊斯兰世界中广泛存在的“反宗教亵渎法律”是有违人性的。在1月15日的文章中，扎卡利亚指出，自1980年到2009年，绝大多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并非是由于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是为了回应美国在中东的干预行动。并由此得出结论，即美国对中东的干预并不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好的选择。在1月22日的文章中，扎卡利亚提出了西方为应对激进的伊斯兰势力所应采取的四部分策略：情报（intelligence）、反恐（counterterrorism）、一体化（integration）和弹性（resilience）。扎卡利亚指出，自2001年9月12日起至2013年底，只有42个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而仅2011年一年，美国就有32351人死于枪支、33783人死于交通事故。因此，对待恐怖主义应继续“保持冷静、坚持下去（keep calm and carry on）”。在2月5日的文章中，扎卡利亚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指出恐怖主义从来都是弱者的武器，“伊斯兰国”也并不像它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强大。因此，对于它们的无理要求，其他国家不应盲目遵从。在2月26日的文章中，扎卡利亚反对美国开展对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战争。扎卡利亚认为，今天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矛盾不同于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因为共产主义是对全世界都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而伊斯兰教只对伊斯兰国家有吸引力。因此，在今天的世界即便存在着意识形态战争，也应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战争，而不是美国的战争，美国对此应采取观望态度。

[整理：缴懿鑫、唐铭兴、李萌、马刚]

[责任编辑：宁鹏举]

## 国际关系中的批判方法：技术，工具和行为的政治

克劳迪娅·阿拉道      杰夫·于斯曼斯\*

**摘要：**在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方法被越来越普遍地放置于主体位置。本文探讨国际关系中方法的角色，并主张如果脱离组织实证材料和研究设计的中性技术进行概念重组，方法可以作为关键项目的一部分。它提出了将批判方法进行双管齐下的概念性重组，那就是将它作为制定世界规则的策略和瓦解特定世界的行为。发展这个概念使我们能够研究预测知识的前景和政治风险的方法和方法论，而不是专门的本体论、认识论或理论。它也能使我们从科学性（以及弱一些的系统性和严密性）的统治中移开，去理解方法并不是那么纯粹、那么正式的，更混乱并且更具试验性，承载着大量的政治信念的一面。

**关键词：**批判的国际关系；民族学；文本互涉；方法论；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性

### 引言

通过方法和方法论来理解国际关系学科意味着什么呢？方法论对这个学科提出的批判性和政治性问题有什么影响呢？从事国际关系的学者们是如何形成探究模式的呢？它和这个学科中关键的方法们有什么关系呢？在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方法被越来越普遍地放置于主体位置。出版商资助大量关于方法的书籍，研究生被要求上方法论课程（而不是所谓的理论课），并且资助者要求关于方法的长篇论述。一方面，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都在社会科学中被看作是能推动研究的严密性、系统性、客观性和可信性的。另一方面，方法因为它的纪律性或“卫生性（John Law 的术语）”而被批评。那些争论的中心——实质的政治分歧和世界观的不同，通过对收集和处理数据的技术的讨论和建立普遍真理的共享方法的研究以及对社会科学联合的想法的投入而中和。因此，国际关系中重大的辩论已经要么走向本体论要么走向认识论也许就并不奇怪了。尽管有其他区别，建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向本体论和/或认识论靠近而与方法的力量背离。根据这种观点，只有将方法论从方法的暴政中分离出来，并且将其重新定义成一个包罗万象的认识论和元理论，并进行反思，方法论才能被解救。方法论因此被归入讨论概念构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理论整理中，而且最好能成为组织经验材料和实际的研究设计工具的反映。

对方法与传统方法论的主要批评是关于其科学的工具化和学科研究所渴求的有序性的“保障”。然而，一系列的重要国际关系学者已经转向研究更加关注方法论和它在关键项目中的综合反映。例如，Jennifer Milliken's 对话语分析的文章已经成为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法的参考文本。最近，Lene Hansen 已经把方法论牢牢地放置在重大安全研究讨论中的

\* 本文原载于《欧洲国际关系期刊》2014年第3期(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4, Vol.20(3) 596-619) 作者克劳迪娅·阿拉道 (Claudia Aradau),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教师。杰夫·于斯曼斯 (Jef Huysmans), 英国开放大学的教师, 他的地址是 Centre for Citizenship, Identities and Governanc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Open University (UK), Walton Hall, Milton Keynes, MK7 6AA, UK., 他的邮箱是 Jef.Huysmans@open.ac.uk。



中位置。在关于国际关系的科学角色的辩论中，Patrick Jackson 认为方法论是主要反映。随着对民族学兴趣的增长，《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近日刊登了一系列关于自传式民族志作为国际关系重要干预的文章。关于民族学作为重要国际关系研究的讨论也于近日激增。同样，建构主义者和解释方法已越来越多地说明方法是远离实证主义的，并且是“概念空间的自由浮动的工具”。在重新关注危急性和方法论之前，Hayward Alker 在他提倡国际关系人道主义方法时就预料到了方法论问题的前景。从 Christine Sylvester 关于作为国际关系女权主义方法的“移情合作”的构想，以及 Cynthia Enloe 的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还有 Ackerly 等人编著的新书《国际关系中的女权主义方法论》(2006) 看来，方法和方法论也已经成为女权主义讨论的中心。

以我们从一些方法上的思考和方法论的现状获得的提示来看，我们认为方法和方法论的映射可以成为重新审视批判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关键点。这需要两个紧密关联的步骤。首先，方法需要被理解为是行为性的而不是具象派的。他们不是从现实中提取信息并将其运用于与知识联盟或对抗的简单技术。其实，方法就存在于世界中，并参与它们的塑造。至于行为，方法是通过“真实”世界来制定的，在已形成的感觉和正在形成的意识中都是这样。这一步挑战了一般的讨论顺序，这个顺序涵括方法和通过问题、问题的表述、本体论、认识论和概念上的工具箱来驱动的方法论。我们提出的方法的概念并不把方法作为一个特定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果，这样一个特定的方法只能应用于某些哲学立场中。方法尝试性地连接和装配本体论、认识论、理论、技术和展示实际效果的数据。

我们做的第二步骤是将概念化的方法政治化而不是价值中立化。他们通过制定实质性和/或破裂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立场来干扰。方法的纪律性政治对于重要的国际关系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并不新奇。对于 Dvora Yanow，因为他们在学者中引起争论并提出“知识认可中的权力因素”，所以方法是政治性的。因此，方法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不为创造共同的背景，而是为了权力斗争，世界的竞争法则和/或在国际政治的世界中制造破坏。

类似 Yanow, John Law 主张方法包含至少两个“商品”：真理和政治(2004: 148-149)。Law 转化了方法的理解和缠绕真理和政治的问题，而不是把方法归于一个单一的科学和非科学的问题。从超出“科学问题”的方法重铸中获得的提示来看，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将方法概念化为“策略”和“行为”，方法的政治可以被理解得略有不同。理解为策略，方法可以用来制定社会和政治世界。理解为行为，方法可以用来分裂社会和政治世界。这种双重概念化也让我们获得了对批判方法的理解。

因此，我们要问：如果在我们调查的中心，我们将问题穿插进批判方法而不仅是批判理论，穿插进实质性的政治视角而不仅是方法论的多样性，国际关系的重要研究会发生什么？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探讨当把承认方法作为探究焦点时，国际关系中有什么样的关键项目可能出现；一种观点通常被看作要么恰恰中和知识中的政治赌注或仅从预先存在的

理论和本体论出发。为此,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重温一些把方法论的问题和国际关系议程中的方法放置入批判方法的文章和讨论。鉴于一些僵局和文献的限制,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将方法作为“策略”的第一次再概念化,并解构知识和方法概念中投资的政治赌注。在第三步中,我们从作为“行为”的方法中获得知识和政治批判的不同方式。我们总结了一系列对批判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双重概念化的含义评论。

### 批判性方法论的“转折”?作为技巧的挑战性方法

IR 的原则已经快速地接受“转折”的语言。例如,“语言的”或者“修辞的转折”,“建构主义的转折”,“审美的转折”,“伦理的转折”或者“物质主义的转折”同时发挥着政治计划、学术资本(和资本化)形式的作用。如果一个人去查找在过去 20 年左右出版的书籍或论文的标题和摘要,原则转折的清单可能会急速增长。然而,“转折”的隐喻也是有问题的,由于其在“之前”和“之后”以及相对连续的调查形式(一个别的东西的转折)假定了一个清晰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转折”的语言对于理解原则内什么正在发生无益。然而,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在论述“转折”时插入必要的方法论可以表示 IR 中关键方法的特定存在或空缺,特别是当 IR 中已经形成不同的“方法论转折”时。

方法和方法论是现在时的——甚至过于如此——在资助研究和划分哪些研究值得做和哪些研究尚未细致、合理或者充分考虑的研究之间的边界的实践中。Law 恰当地被概括了方法这种过度和主导性的存在方式:

如果“研究方法”被允许声称方法论的霸权或者(更甚者)垄断(并且我认为他们已经在一些场合下试图做这件事了),当我们与这些方法发生联系时,我们就会被(不情愿地)放在一系列限制条件的监视下。我们被告知我们应该怎样思考和我们必须做什么。

与作为一种原则性和限制性的工具的方法扩散相反,批判性的学术实践已经采取一种远离方法论要求限制的策略。这导致了一个两面的运动:一方面是本体论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是认识论的特权。Ole Wæver 对于范式间争论的分析抓住了这一运动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争论中远离方法论而趋向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趋势。相比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行为主义-传统主义的争论,第三次争论包括了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使用不同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假定的问题。第四次争论(理性主义-反思主义)通常被认为代表了认识论、科学的角色和知识创造模式之间的分歧。在 Wæver 看来,第四次争论是典型的哲学式的;它是关于“考虑客观性,主观性(作者、签名和作品),客观/主观的区别,二分法的使用,西方形而上学对于看似矛盾的思维方法的规则的基本假定,以及语言的参考性和相关性概念,以及更多”。在他做的关于政治的问题、哲学和方法表面在一个或者其他四个争论的划分中,方法论与第二次争论(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争论)相关并且仅次于第三次争论。争论分析的是这些因素中某一个因素的优先性。方法和方法论有被推向背景层面和与之前争论相联系的趋势。特别是在后实证主义方法中,“方法”越来越为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指责所污染。因而,方法论的质询可以被看做是被批判性方法所内在

质疑的。方法变得可疑，似乎它们由于某种原因而更少具有批判性（也即并非不加批评的）和更少政治化。

在这些模糊的或者明确的指责性实践中，Ken Booth 对于作为方法的建构主义的重新定义堪为楷模。如果本体论和认识论都是有特权的——并且政治学是产生于本体论关于世界的假定之上的——方法就是要“低于政治的”。在《世界安全理论》(theory of world security) 中，Booth 反对“方法”的“理论”并且将建构主义定义在后一类中：

首先，与许多假定相反，社会建构主义不是国际关系的理论。它没有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国家之间的政治，例如，国家、权力、无政府状态和战略的。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关系）的运行方式的方法，或元理论。

通过只是作为一种“方法”，建构主义对于政治和非政治是双面降级的——它不可能是政治的，因为它并没有反对主导理论的“理论”，而且由于它不能导致争论，它是非政治的。据 Booth 所言，建构主义仅仅作为一种方法“相比构成其基础的政治学假定而言不再被政治地更多的使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Booth 认为建构主义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这正是建构主义者一直以来所极力避免的。

鉴于假设方法作为最终原则的假定，许多批判性的 IR 理论家以牺牲方法论为代价过于侧重本体论和认识论。然而，也可以将 Booth 的断言解读为是格格不入的，并且是对建构主义的指责——方法怎样可以被理解为问题化和介入世界的实践的再述。这也反映了方法能够以一种到目前为止还仅运用在在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内的方式来获得批判性的和政治性的特性。

最近，数个在 IR 中的介入试图使方法和方法论（分别地）远离指责并作为批判性项目的必需元素。方法论获得突出地位的原因既是变化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在 Vincent Pouliot 看来，方法论明确化的风险在于不同建构主义路径之间的沟通是否具有矛盾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在 Friederichs 和 Kratochwil 看来，议题在于在将科学要求理解为“发生在社会实践”的成熟方法论基础上生产有用的知识。Jackson 将 IR 科学性的方法论争论的风险作为一条定律。在 Ackerly 等人看来，有价值的是“方法论的严谨性会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通过强调非因果的认识论，Lene Hansen 的关于作为实践的安全也开拓了严谨对于“理论的严谨框架，‘现实世界关联’的经验性分析，或者数据和方法论”的系统性评估。这些分析通过方法和方法论之间细微的间接差别从而将方法论置于批判性理论的框架之内。

在这个意义上，Jackson 对于 IR 中需求行为的反思和 Hansen 对于外交政策争论的方法论反思对于我们的目的具有特别的意义。就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Jackson 敏锐地区分了“方法”和“方法论”：方法是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技巧，然而方法论是“对于科学研究的逻辑结构和过程的关注”。方法因其发挥“仅仅是技术”的作用继续起到指控的功能，大体上未意识到（或者不重视）Jackson 在方法论反思中所提倡的科学哲学。他对于科学哲学的工具角色的

评论在这个方面是值得详细引用的:

科学哲学不计划教任何人怎样去进行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多元回归检验假设,或者怎样制作外交部活动的人种志记录,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利用这些方法的决定,并且确定我们正在以互相完善或者一般性地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使用方法…实际上,由于缺少至少一个关于特点的战略问题和知识的地位的广义协议,关于怎样最好地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战术性争论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在 Jackson 看来,通过方法论思考 IR 是有关讨论知识科学性的事情。他的政治学是关于在系统性、本体论一致和连贯性的声明下原则之内的知识生产。Jackson 的主要论点在于存在不同的相互之间冲突的科学知识模型,相互之间矛盾但每一个都有其自身分析知识的科学品质的严格标准。尽管 Jackson 提议将方法论作为 IR 争论中的一个焦点,本体论、认识论、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可以交汇,不过他直接重新聚焦于如何使方法论彻底地优先于方法的争论。方法是一个关于缩小世界的理论代表性和世界本身的差距的工具性问题,而方法论则深深植根于元理论领域。

这一方法和方法论之间的差别考虑到了置于方法论争论(科学哲学)内的批判性询问。例如,Colin Wight 对方法论的重新描述以高风险阐明了其所带来的差别:方法论指的是批判性的检验、研究过程和技巧(方法)的评估以尽其能力为我们提供或多或少的用于手头问题研究的可靠知识。以牺牲方法为代价,临界状态直接地与方法论中的兴趣相连接。

尽管 Jackson、Pouliot 和 Wight 尝试使 IR 研究中的方法论多元化,但是科学性的首要保证并非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所提及的,存在“不可见的大男子主义或者男性偏见以一种知识在所有原则中传统地被建构的方式”。此外,“真正的科学的理性范例”影响着一系列的分别和特例,将女性降级到非科学的领域。然而,女性主义者方法论的研究没有完全抛弃科学性的观点。当然,在最近的方法论交锋中,它改变了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严格、系统性和客观性的标准。在我们的阅读中,严谨和系统性是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最常受到支持的特性。Yanow 在方法论教材中从严谨和客观性中吸引人的部分受限制的意义出发开拓了这些哲学概念,以展示诠释性作品可以既是严谨的又是科学的。允许放松对作为技术的方法控制的转变发生了(尽管并非完全没有束缚)。

发展中的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驳不同路径可以最终汇聚在一起共用方法论的观点,在方法论争论被用于创造科学国际研究的支配性景象的机构环境中尤其具有批判性。然而,这一论点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如此重要,对我们而言这些贡献的批判性运动处于他处。更为特别的是,这一文献背景争议方法论是否作为研究国际政治入口的中心点,因而将注意力转移至我们通常认为并不太重要的内容。此外,它暗示了方法论是将认识论、本体论和理论和经验发展联合思考的问题而非简单地做认识论或者调节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差距。最后, Jackson 对于解构内嵌于方法论思维的概念世界特别具有兴趣,因而挑战了 Booth 的观点——方法论不能传递世界政治的重大情境因而中立化了批判性知识的可能性。正如

Sylvester 和 Tickner 提醒我们的，方法不仅是原则和社会科学知识层面的批判性风险，还是政治风险。借用 Mary Hawkesworth 的特别恰当的构想，方法“不仅解释了政治世界的不同，而且巧妙地促进了政治生活的特定模式”。

这些运动为一个真正能够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元理论争论的批判性方法论的转折设置了参数——第四次争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地带且为批判性、政治性和方法之间更为紧密的关系创造了开端。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献也限制了这一计划的前景。通过制造“科学性”或者一个严格的版本或者系统性、环境定义方法论争论的风险或利益，它使得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争议更有特权并且与关于逻辑矛盾的、寄望于认识论差异的世界观的自体论争议相结合。至少同等限制的是大多数文献中方法和方法论之间的明显区别，因而将方法降级到历史的垃圾桶（例如，对那些不是真正创造历史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出于某种原因构想一个方法论的转变，其间方法最多是作为一个次要的或者派生的关切，而没有感到它一直在追求技术。

我们想要争论的是一个批判性的方法论转折，它需要进一步处理以下两个限制。第一，不同于使理论边缘化，我们寻求通过将方法回归方法论的核心以增加批判性的计划并且因此而避免方法和方法论“差异性的哲学盲目迷恋”。当然，这将要求对方法的特殊理解来为实验性连接和集合自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创造一个平台。第二，我们同时强调将批判性方法论“转折”中的兴趣从知识的科学性形式仅转向政治风险也很重要。批判性方法论的转折被投入于使知识和政治风险都变得明显的方法的概念重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谈及批判性方法。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将方法再概念化为“工具”和“行为”。下一节将转向这一再概念化的第一方面。

### 作为工具的方法

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不失真的方式连接经验世界的抽象的理论的技术发挥作用，然而当方法被理解为工具时，它是表现性的，并且能够影响社会和政治世界。从这种程度上，方法“产生影响；制定现实；他们可以实现他们发现的成果”，他们是以一种部署展开的方式干涉世界的。方法不是简单的从外部世界提取信息而留下的不变的世界所展现的技术。在这种程度上，提取的工具是一种主动的力量，是一个连续的生产 and 再生产过程的关系的一部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而创造了世界。例如，某些形式的地理测绘将世界视作一个地球的整体，一个地理实体。颜色编码，画线和命名是使世界地缘政治的形成至关重要的元素。可视化方法，例如，从“反恐战争”和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表现世界。科学可视化和气候变化建模积极地保护了政治回应的产生。数据挖掘方法能够治理恐怖主义同时以无法预料的、灾难性的、最坏的方式展现未来。同样，通过犯罪的视角审视移民，移民与犯罪之间的关系的统计分析支撑了移民罪犯化的观点（不考虑分析结果的话）。Mike Savage 所做的关于 50 至 6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对英国的影响的研究说明了方法在“现代的、理性的、有责任去干涉与

管理的”、有同质国家的、有明确地理界限的，有特定群体构成过国家的出现中扮演的角色。

视方法为表演的设备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明显的，特别是当说明像可视化，数据挖掘或统计这些方法在社会和政治世界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然而，它也有它一个令人惊讶的边缘，因为它说明方法可以不被理解为元理论和理论视角的应用或这些视角和现实的中和，却被当做是工具的体现。只是存在于工具中，并且通过行为而不是代表被创造出来。“铭文工具”概念在科学和技术研究中的运用是为了研究知识生产不仅发生在讨论书中生产的铭文的意义的过程中，统计表，扫描等中，但也发生在铭文的研究设备本身中，或者，换句话说，在铭文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铭文工具是一套在其他形式的材料上生产铭文或痕迹的系统（通常包括，但不仅限于，机器）。地图与水，空气，土壤或被描绘出的国家不是完全一样的。没有统计数字重现犯罪和移民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的发生。

铭文装置可用图，字典，图，机器或叙事形式表示，用Latour的话说，“把东西画在一起”。我们感兴趣的批判性方法论上的转折不仅仅是一个向标志方法的转折，而是一个用前台操作的方法的制定材料的工具制定着世界。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提到了材料和表演的方法，设备被视作“连接概念和实践，认识论和本体论，虚拟和实际的铰链”。这些设备可以被科学家，医生，市场分析师，外交官，国际关系学者，反叛乱专家等使用。例如，网络分析被安全专业人士以及鉴定安全分析人士和国际关系学者使用；数据统计被用来研究bourdieuan领域和情报工作。作为工具，方法从多种角度影响了社会和政治世界，在绘制世界不公平情况地图鱼绘制世界恐怖主义地图时，恐怖主义的世界是不同的。

我们使用设定的概念代替“建设”或“构造”保持实体的脆弱性获得关注性。“建设”或“构造”倾向强调稳定。“制定”的概念在方法论中表述为：“允许物品和对象随时间变化，使他们的身份变得脆弱，允许他们在每个场景都变得不同”。这种方法的理解，使它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将方法视为理论联系实际，表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相反，他们以不断变化的方式改造世界，事物脆弱的身份。

我们如何理解方法是重要的。在大多数的文献中，方法和方法论概念地调动要求严谨，系统性，科学性和普遍性。方法名称中痕迹混乱的生产移至背景，铭文可以毫无问题地指着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方法是一种工具，不仅表示生产，而且绘制这些陈述的卫生性（带走污垢，物质生产和选择），从而使图上，论文上，记叙文上，图表上的铭文等可作为现实。这种思想方法技巧导致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把方法从方法论中分离出来，思考方法是应用一个预给定工具而没有任何令人兴奋的地方。然而，铭文通过排除一些和忘记他人来包含对方法的理解致使这些区别更混乱。从排除现实与被遗忘的人在这个角度上，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方法论的实践的可辨别性和非数据的角度来维持。例如，使用统计分析来确定社会模式往往不包括明显偏离模式的个人的经验世界和生活。人们的生活是不同的。例如，一组消费高文化的穷人是几乎没有有统计学意义的。其他一些没有被计入的现实根本不会被考虑，他们存

在于被遗忘的世界，世界的方法清除了文化模式的设定和消费水平的。在这个意义上，方法从效果上讲是实质性的。

把方法为工具并不意味着本体论，认识论和理论都是次要的。相反，我们的观点是，方法是实验性地连接和组装的本体论，认识论，理论和世界，产生知识的工具。换句话说，方法的前景不是方法的重要性超过方法论，而是强调方法影响的转移。中心点是看把方法作为连接和装配设备，以及方法在社会和政治世界中产生的影响。连接是一个实验性的，混乱的和可能失败的组装过程。

为了说明作为工具的方法是怎样实现连接和装配的，我们来看看Hansen开发的借鉴后结构主义的见解的一种外交政策和安全分析的文本互涉的方法。方法如下：

了解国外的交叉了一系列媒体和流派政策文本的文本互涉，需要知道这些是怎样连接的和对文本建立如何权威和他们谈论某一问题的能力的深入的理论。

文本互涉意味着理解文本是什么以及它如何产生意义。在语言的转向上，文本进行或通过参考其他的文本构建外交政策和身份。外交政策在文本和体裁之间的联系间进行。这些文本通过他文本交织获得权威和表达政策的能力。文本互涉是Hansen工作方法的核心，它顺利地从前建构主义的元理论思考和理论角度思考国际政治，并按结构设计把它转化成结构模型，其中包括在波斯尼亚战争的辩论分析。尽管这些不同的步骤提出了从哲学上更实质性的和一般性的研究，它们仍然连接在一起工作。

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重要的选择不是在讨论了后建构主义和外交政策中的身份理论后做出的。文本互涉可以被视为铭文工具，它聚集了一系列东西与资料并以特定的顺序将其排列起来。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看在选择文本方面的指导。第一点是文章的主体应该从研究中所做的文章中选取，而与之相关的以前的文章也应该在文中被提及。第二个建议是：文章的关键部分应该是“经常被引用且在文本互涉的辩论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内容”。乍一眼看上去，这两条建议看起来像两条简单的忠告。但为什么要选取没有明确指向的文章，或从某个文集里随机的收集一系列文章呢？事实上，这种选择背后有更加实质性的原因。文本互涉要强调各个时期文献的特性，还要按照参考文献的与研究相关性来确定其重要程度，这是其独特的选择与加工文本的方法。而选取文献的标准会影响到某个概念在文本中的含义以及文献被引用的方式。文本互涉是一个维持文章同一性的工具，还能通过引入外来的文献来将各权威文献的区别加以存档。虽然这一研究延伸到了一些非主流的文学体裁上，例如旅行写作，Hansen还是强调如果在研究外交政策时，开头一定要引用政府文件。

在一个有关政治身份建构的研究中，这一点或许体现的非常明显。然而，在文本互涉出现的部分采取精确的指导是值得关注的。Hansen的文本互涉理论与Kristeva的有很大不同，Kristeva关注的是证明“定义”本身内生的不稳定性或说意外性，文本互涉是一种解构工具而非身份建构工具。对她而言，这个客观存在首先是在文本中的，并且与制度来源和政治观点并无联系。外部的参考文献是用来证明文本中的定义是如何不稳定的，并且暗

示确定定义也需要一整套建构和解释的技巧。文本互涉并不是为了提出确定的定义,而是说明文章的根本意图其实是不确定的。它批评了文章滋生的能力以及人们习以为常的“含义”所具有的属性。文章中运用的多种引用和机构资源都并不重要。任何文本都可以用来分析“定义”的非功能性的特征。Hansen 和 Kristeva 对文本互涉的解释并非是相互孤立的,Hansen 吸收了 Kristeva 的一些观点,并且运用了后建构主义的一些理论,同时,他对不自然化“定义”也表现了一定的兴趣。然而,连接相似的元理论、理论和世界的两个工具存在危险有着不同的话语分析作用。

将方法视为存在论、认识论、概念发展、数据收集方法和客观存在的桥梁与组合,而非简单的将其视为对于存在论和认识论的选择的表达,是很重要的一步。同时,这也意味着一些别的东西。如果方法将上述的元素按照从存在论与认识论下降到理论与概念建构再到方法的顺序整合起来,而不是上述元素的单纯表达,那么方法一定是试验性的。对于研究性的问题或者一系列可以推动认知发展的事件,例如移民的资产证券化,地缘政治的转化,危机管理的风险,防范人口贩卖,对自由运动的规范,等等,来说,多种元素之间的哲学一致性是不太重要的,同时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实验性的组合以及数据和概念框架则更加重要。因此,我们提出的方法的“工具属性”是更需要探索且更为混乱的,而不是符合逻辑且程序严谨的。这种倾向于行为层面的定义使得干扰方法与评估而不是其哲学系统性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使得引导科学研究的原则不再是严谨性和系统性,而是试验和灵活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于方法论的理解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即使在系统性和逻辑性都已具备的情况下,科学时常还是要通过这种途径模式来运作。将对方法论的这种理解变得简单明了可以将科研惯例从系统一致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且鼓励更多强烈而明确的组合与发明的出现。

这种对于科学研究的理解视角与 Wight 和 Jackson 提出的是不一样的。对我们来说,方法是表述性的,是碎片化、不完整的,但同时也是破坏性的。Wight 提出的存在论优先的理论和 Jackson 提出的从哲学理想型的角度对方法论进行的分类,都认同一种封闭的,一致的“知识体系”,它是研究的标准,与作者所认同的根据研究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状态来判定其性质与数量的做法截然不同。对我们来说,方法是对规则的挑战和对界限的突破。它的混乱性正是它的优点而非缺点。我们的方法是否是“怎么都解释得通”的?从某种层面上可以这么说,但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则并不是这样。研究一般在社区,对话,挣扎中展开,这些环境中,“严谨”是被禁止且重新配置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环境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它们还包括提出规范的政治家,运用工具的研究者,公民科学家等等。

这种对方法的理解说明 Jackson 那种允许多元论并存的理论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对多元论的支持在学术背景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非常支持,然而这并未关注到多元论领域中的“选择的政治性”。百花齐放的方法论领域也是百家争鸣的地方,争论的焦点不仅仅是关于什么是最好的科研方法,还有关于在制定方法的时候选取什么样的主客观信



息。一旦一个研究者认同方法规范了世界，关于方法的问题就会变成关于矛盾的、多样的关于客观与主观的“概念”问题。这一问题是在知识领域与政治领域均会涉猎的。就像 Law 等人说过的，我们也在政治领域做着交易，在社会客观与主观的问题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方法得到更多答案。

将方法视作工具让我们对于方法的部署作为实证主义者或后实证主义者有了更加批判的眼光。首先，我们可以让被方法规范的客观现实可视化。例如，John Law 的关于调查这一方法在欧洲晴雨表的研究中的应用表示，调查将欧盟定性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实体，表现为一个同类人口聚集的同质的概念化的区域，它产生的数据和调查结果是描述和影响社会存在的可靠工具，也是对于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浪漫的哲学描述。其次，方法的混乱性为我们提供了动摇固化的方法论惯例的机会。最后，我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的组合中创造新的连接方式。反向绘制（counter-mapping）作为不同的影响客观现实的方法就非常著名。

此时，关于批判性知识的问题不可避免的与方法论的转变联系起来。临界状态不仅是关于知识的界限，也是关于被知识所影响的客观世界。在下一部分中，我们会将方法视为一种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从而讨论由其引发的政治可能性。

### 作为行为的方法

我们为方法的再概念化所做出的内在相关的转变之二将方法解释为行为。正如前一章节中所展示的，方法制定了特别的世界并在其中充当知识的角色。然而，方法作为工具以脆弱的方式制定的世界并且只能维持短暂的稳固。有时，工具失败；在其他时候，工具能以微小的方式成功地制定特别的世界，阐释真实的知识，通过塑造世界进行政治性干预。方法作为工具具有临界的特定模式，通过阐明某领域的含糊定义，知识替代是有可能的。制定意味着与社会安排以及这些安排的干涉作斗争。

方法作为工具通过制定特定的世界同时使其他变得更加不明显或不可见，对知识和政治体制起到作用。我们已经提到了社会网络分析的作用以及连同安全专家和社会学家的日益流行。另一个争论最近关注民族学的方法和人类学知识的系统化，目的是平叛行动。基于对当地条件和人口的特许存取权，民族学方法已经在生产和特殊安排的斗争中被调动起来了。与此同时，这些主张用知识进行政治询问，例如人类学家和安全专家的关系、研究人员和学科的关系，以及采用民族学方法的政治影响。为了应对在“反恐战争”中平叛行动的民族学方法的政治活动，人类学家已经加紧了伦理学研究并通过了他们通过新的批判性审视的方法。但是，如果对民族学实践和“从事人类学”的批判性审视要求主要集中在伦理学研究而不是民族学方法上，方法概念化就将批判性和政治性置于有关方法争论的核心。因此，这不仅是一个民族学方法部署道德或不道德的问题，而且是民族学方法的政治性问题。

如果方法制定特定的世界，他们实验性的连接和组装也能在这些世界产生破裂。为了呈现方法的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将方法称为“行为”。民族学方法已经在国际关系中取得了

更多关注,政治中心在由 Loïc Wacquant 对美国城市民族学的指责引发的争论中变得可见,它主张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福利改革”。在对三本记录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的民族学书籍的评论中,Wacquant 认为它们的作者采用种类的流行观念作为分析类别,浪漫化和教化穷人,从而通过强调个人责任、道德劳动和“价值观”操纵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游戏。民族学方法陷入新自由主义者的穷人管制和国家的“监狱辅助综合体”。Wacquant 反对这种“天真的”民族主义,提出具有 Bourdieu 精神的社会学方法,它重视历史力量,体现机构和战略,以及阶级和种族关系。然而,提出一种结构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真正“防卫”政府集团的合理行动和实践,结构性方法也能被视为与 19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福特主义福利国家的兴起有关。Wacquant 的方法研究仍然可以解读为对方法颠覆性和政治性的再阐释的尝试。

对方法作为工具的理解分析出方法如何制定世界的问题,作为社会和政治事件的一部分和创造世界,比如人口和不安全的社区。方法作为行为的概念化介绍了批判性和政治性方法的另一方面。方法作为行为可以在更强烈的程度上被理解为混乱的世界。在将方法概念化为不仅是工具也是行为的过程中,我们从 Engin Isin 指出的行为与“习惯、实践、管理、纪律、常规命令、人类如何表现自己的品质”的区别中得到启示。在日常语言中,行为指的是做了什么和实践的过程行为是表现性的,就像工具一样。这是“言语行为”某种意义上的使用。同时,行为让我们更重视破坏性行为结果而不是行动性声明和制定暗示。不像强调秩序和让实践进入社会科学,行为强调破坏和分裂。Jef Huysmans 最近提出这个将方法视为行为的颠覆性理解,重新激起了关于安全实践影响的争论。在此构想中,一个行为导致“破裂场景自身的创建,不管接受和制度化”。因此,方法作为行为在生产知识和与方法作为工具的斗争中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在此意义上的理解,批判的方法不仅破裂知识,而且有能力影响政治破裂。

本节关注民族学方法,让我们看一看最近国际关系中民族学方法的讨论,可以进一步理解我们在这里提出的第二个再概念化。民族学方法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流行,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学的改变”。然而,Wanda Vrsti 抨击一些这方面的文献未能考虑批判人类学的讨论。不同于其他女权主义者、构成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一起工作,Cynthia Enloe 只是一个“有民族主义感的人”,而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具有批判人类学的民族主义者。对 Enloe 的主要指控是女人的声音不够活跃以及“格式化风格的效仿”没有向“多元的声音、生活方式和政治策略”开放。然而,随着 Wacquant 的批判渐渐明朗,关于民族学方法的争论不能集中在叙事和文本形式,而且需要分析它的政治影响。

无论 Enloe 的工作是否应该被理解为民族学,Vrsti 的批判提出了一个关于三角测量方法、知识和政治的更普遍的问题。这意味着有一个更合适,或者更充分可信的研究民族学的方法,她认为民族学方法的意义在于其形式。在第一种情况下,民族学知识的可信性和真理声称的可靠性将会是用研究构成的民族学合理实施的结果。然而,Enloe 的文本方法,包括“民族主义感”是建立在它运用在知识和世界的物质上的。世界不是通过方法形式制

定的，而是通过方法包含的实质性定位。Enloe 的工作，与 Haraway 对于情境化知识的呼吁没有什么不同，由在世界上享有地位的方法推动——在她看来，是一种女性的实践。她将“女权主义的好奇心”发展为“搞清如今世界两个最强大趋势——全球化和军事化的联系的重要工具”。“女权主义的好奇心”并不适合一个预先给定的工具，也不表示一个特定的女权主义技巧。相反，女权主义的好奇心可以被看作一个 Enloe 在工作中发展的实验组合，对 Enloe 来说，女权主义的好奇心同时提取信息和扰乱全球化和军事化的世界。质疑女性的条件使一些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质疑的焦点，例如“廉价劳动力”的问题。

对于我们，Enloe 的方法不能减少适当理论和方法的纪律的政治。Enloe 在她的著作中反复使用“政治行为”和“整治行动”的语言。例如，在《全球化和军事化：女权主义者制造联系》一书中，她指出：

开发一颗“好奇心”包括探索、质疑，即拒绝接受理所当然。一个人对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是没有好奇心的。开发一种好奇心不仅仅是学术的，它需要能量，它是文化，它是私人的。坚持提出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质疑可以是一种政治行为。

我们认为，将她那具有破坏性政治影响的方法看作行为需要严肃的态度。女权主义的好奇心分布在学术规则、国际组织和公司中。在分布时，它会破坏这些世界，例如通过在学术中制定女权主义或通过挑战中性在国际劳动关系中使用“廉价劳动力”。当“女权主义的好奇心”被劳工组织发展起来，廉价劳动力世界的制定就会与“廉价劳动力”通过中性的计量经济学或实施计划的个人的权力制定的时候有所区别。在这样做的时候，方法已经将世界带入其中，而不是简单的形式研究。

对于 Enloe，女权主义理论不包括方法。方法也不仅仅来自于女权主义理论。相反，女权主义的好奇心是一种以概念和经验为实验的行为，并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的与工具相关联，目的是破坏知识和实践的主导形式。Enloe 的方法都与她在《香蕉、海滩和基地》最后的主张“个人的即是世界的”分不开。这句话的前面和后面写道：“个人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个人的。”此主张是一个使女性可见，尽可能多的了解国际形式为什么以及如何形成的目标、方向。阅读这句话的前后，这也是一个关于知识和政治的主张。Wacquant 指出，在这个意义上，Enloe 的工作与一些民族学工作所做的相反。方法暗含的排序不仅是简单地介入文本的建立和“真理”再生产——也即，世界的代表——还是在政治性分裂上的尝试——既存在于学术性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中，又存在于实践的等级化组织的世界的对抗中——例如，同时存在于女性劳动力和股票市场世界中的企业。Enloe 的方法最重要的不是民族学研究的形式甚或是其互文性。像 Hansen 一样，Enloe 与各种各样的文本工作。然而，女权主义的好奇心经验性地集合了各种方法、理论、本体论、认识论的要素，以这种方式，它们制造了政治破裂。女权主义的好奇心促使 Enloe 通过国际政治的工作拒绝了一系列非中立术语，如“军事配偶”、“娃娃兵”、“工厂经理”、“血汗工厂工人”、“‘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掠夺幸存者”、“和平主义者”、“军阀”、“占领当局”，显示对女性和男

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缺失好奇心。此外, Enloe 认为如果机构运用女权主义好奇心的方法, 就会破坏他们当前制定的世界, 不同的世界一定会被建立。重要的是方法产生的实质性的破坏, 无论 Enloe 的方法是“纯”民族学的还是只是“有民族主义感”的。

对于方法作为行为的概念化, 我们不建议所有的方法被认为或应该被认为是断裂的。我们的建议是将所有的方法看作工具, 无论是世界内还是世界外的, 无论是产生真理还是政治的。但是, 作为行为, 方法可以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它们破坏特定的脚本, 安排制定世界。方法作为行为的具体政治不取决于它们的形式, 例如, 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 或是本体论的视角即所有知识都是政治的因其代表了部分的世界。换句话说, 从方法在世界中循环并在循环中制定世界的视角, 得出行为的概念使我们超越本体论的政治的观点。对于后者, 方法是工具的概念足够了。它包括方法干涉社会的观点, 通过宣称世界的知识和它的政治。通过这种方式, 方法作为工具还有制作可见的另类世界的政治观点。然而, 这样的概念化并不关注方法的分裂性特质, 也即偏好意想不到的、次级的、被遗忘的和边缘化的事件。后者是方法作为行为的核心, 并定义了不同的政治。

方法作为工具和行为, 是脆弱的和破碎的。它们是系统的整体, 就像一个特定的统计方法, 一个纯粹的民族学在其历史内整体合并所有的改变和主张, 或系统化的话语分析要求一致性和精确的运行。工具可以失败稳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方法作为行为常常借用和结合各处的碎片, 并试验新的组合产生断裂的影响。正因为实体移动设置了世界, 它们是脆弱的, 从某种意义上常常被那些将方法视作以其形式和一致性提供信度的人严重质疑, 而且它们也不总是产生这些人所追求的惊喜。在它们的脆弱性、碎片、地位和经验中, 方法能够成为行为。它们可以通过支持征服知识、学科和客体以创造脆弱的客观事实来干预和破坏预定的世界。因此, 方法与方法的词源意义有更多的相同点, 可以理解为追求一个目标, 而不是一套被认为科学的工具和程序。

## 结论

这篇文章从工具和行为的角度对批判方法进行了双重的概念化解析, 质疑了在国关领域乃至社会科学领域中, 将方法视作技术的主流观点。这篇文章借鉴了国关学科中对关于将方法与方法论运用于批判的辩论, 并且认为如果将方法视作在实验层面上连接与组合本体论、理论与认识论的桥梁的话, 方法本身也可以是批判的。

然而, 方法并不是简单的源于本体论、理论和认识论第一步, 我们论证了方法不仅有连接功能, 更有表达功能。他们规范了世界, 并使某些规则更加突出。通过对 Lene Hansen 的文本互涉理论的研究, 我们展示了不同的文本互涉是怎样影响不同的世界的。Hansen 的文本互涉的运行机制与 Kristeva 的不同, 文本互涉的区别是基于方法形式的区别——例如定性研究相较于定量研究, 案例分析相较于调查研究, 自传式民族志相较于绘制机会结构, 是从属于运用这些方法产生的文字结果的。同时, 相较于方法论而言, 对方法的研究则显得更为杂乱, 这是由一系列原则相较于正确的调查方法评估的。例如对于 Latourh 和 Law

来说，工具是各种各样在实验室中有他们各自用途的工具，但同时他们也属于相对更加复杂的体系中。这个体系包括其他设备，铭文和人，而这些让这一体系更加复杂。

我们对方法的第二种解读集中在其行为特性上。如果说方法的设备功能塑造了世界，那么方法的行为功能则可解释方法可有破坏性的后果。我们运用 Cynthia Enloe 对于女性好奇心的研究老论证方法的行为特质。通过对女性好奇心的研究，Enloe 研究了女性的生活，从而颠覆了传统的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在我们看来，将方法视为行动可以打破固有知识和社会、政治惯例，由此看来，Enloe 的研究更像是实质性的干预而非单纯的形式或程序。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女权主义好奇心不仅仅关于民族志，文本互涉，采访或谈话分析的运用，更多的是将研究方法视为一种行动程序所能带来的实际影响。我们已经论证过，方法的设备和行为属性，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视角。

这里谈到的对方法的双面解读与在国关中从三个角度理解方法不同。我们将方法视为获取知识和政治的途径，从而防止在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哲学性的过度关注。我们将方法视为影响知识和政治世界的途径和切入点，而不是元理论。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关注点从将方法视为哲学的汇总，变为关注其政治价值。这样的双重结构下，方法显得混乱而脆弱，而不像在大多数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显现的那样带有严谨、科学、客观的特征。除了传递那种严格的和客观的包含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知识，最有趣的方法论提出了它是怎样理解的以及它是怎样提出最弱的客观性和混乱的真相让自己处于险境的。

我们对于方法的重新解读并不是源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区别。从工具和行为的角度看，方法并不关注统计分析、调查、网络分析、民族志等手段是否被用到，也不关注“纯粹”对方法来说是否重要。对我们来说，关于方法论的讨论是关于被方法论影响的真实世界，以及这些影响可能创造的切口。这种理解需要中立的、有实验价值的连接与组合方法。最后，将方法论视作工具与行动意味着它不具有方法的纯粹性，即在不同状态下共生的能力。这种做法点明了方法的政治价值，同时说明了方法所影响的世界中的挣扎。

[翻译：王 燕、胡阳阳、许译丹、于凯玥、李 萌]

[责任编辑：李 萌]

[校对编辑：胡阳阳]

## 英采飞扬

**【编者按】**本期收录了两篇学生习作。第一篇文章是来自许译丹同学的一篇书评，作者在读完《改变思想，赢得和平》后，结合美国公共外交的现状发表了自己对于此书的评论；第二篇文章来自大一新生刘长松，作者结合课上所学，发表了自己关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观点。

### Changing Minds, Winning Peace

Yidan Xu \*

This book offers a glimpse of a series of strategic directions and several operating processes which are require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of USA aiming at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001. The writer of the book, Edward P.Djerejian, serves as the chair of the Advisory Group (suggest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Powell), led the other 13 members to accomplish a report about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ians as a recommendation. In the 3 months of their investigation and accessing process, they have contacted dozens of specialists and practitioners in 7 countries (Egypt, Syria, Turkey, Senegal, Morocco,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from an angle of civilian and abroad,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a conclusion and analysis of their strategies in accordance with USA's long-term struggle against the forces of secular as well as religious extremism, this book does provide us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overview about how to tackle it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multiple elements and concrete suggestions.

I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it simply illustrate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US governments as well as the present crisis and challenge that they have encountered. As it is a report to focus on the tactics and strategies, the chapters ahead serve as a basis of the whole book in order to better put forward the main suggestions in the next chapters.

At the beginning, the United States that lacks the capabilities in public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whole book. More importantly, the national security has been threatened by political instability, economic deprivation and extremism, from which the threat emanating from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counts more. In such situations, the public diplomacy necessitates a new strategic direction, which will comprise the will of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after several procedures. In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resentment of the citizens abroad, especially in Arab and Muslim world, toward the American policies increased accordingly. This can be confirmed in the confrontation in Arab-Israeli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Arab and Muslim

---

\* **Yidan Xu** is a juni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Kai University.

countries. Thus, the entire system of public diplomacy urgently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and deep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two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One i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that guides the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e other is the vigorous measurement. With these two fundamental elements, the suggestions afterwards are made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them.

Considering the contemporary status of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American, it is far from adequate, just as written in the book, the Advisory Group get a conclusion that through the greater focus, commitment and alternations in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resources, the downward trend will be reversed in a short period. First and foremost, an effort to separate the questions from communicating the policy is the main point. That is the part of function of the Advisory Group. What's more, before the execution of the policy, an assessment to appraise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icular policies is necessary. With the assessments, the policies can produce intended consequence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Public diplomacy is a systematic mechanism that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White House. At the same time, the purp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reinfor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e public diplomacy offer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nce to support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s well as its regimes. Long term speaking, the American values, including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reform, all must be concluded and manifested in its strategic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transform its way of explaining and advocating its values and policies toward Arab and Muslim world.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Arab and Muslim world are their main focus, and the society of these countries are at crossroad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liberty,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ocial equity. Just as mentioned before, the hostility of the Arabs and Muslims toward America ascended a lot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s. As a result, they may reckon that the deed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the economical support and the educational help are with vice intentions. Some of them may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determined to deny them from freedom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Here lies in the contradiction. Several key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allenge in the region seriously, and the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Advisory Group should aim at minimizing the gap between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ome cases we witnessed that the ambivalence of the first beneficiaries of democracy in Arab and Muslim world tend to be the extremists. Sometimes this situation is not eas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tackle with.

Some Arabs and Muslims admire the universal values hold by the American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one by the Advisory Group, such as the technology as well as some

accomplishments. The Americans are told that “we like Americans but no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doing” This attitude to the Americans offers the Advisory Group eve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 hope to transform the public diplomacy to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Based on this judgment of the Arabs and Muslims, reconciling the contradiction through effective convers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next two chapters, the coverage takes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the whole report. The writer gives the specific instruments to implement its public diplomacy. After the multi-faceted element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the policy makers having been introduced, the next stage comes the new operating process and architecture for a transformed public policy. Only through this strategic and systematic procedur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cts as an integral par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ttacked by the terrorists on September 11, 2001, the Americans were shocked by the news and were caught unprepared. The significance of a serious of military weapons and protection toward the extremism became apparent. In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Advisory Group, they help the policy makers to enact the relevant policies from several comprehensive angles, which includes the financial sources, the human resources, government-sponsore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ccess to American education, centers, corners, and rooms, publications,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 exchange programs, center for US-Arab / Muslim studies and dialogue, English teaching, speaker programs, the private sector, including NGOs, intercultural and interfaith dialogue.

Among these measure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rank first among the others. The Advisory Group has calculated only about \$ 150 million of the \$ 600 million public diplomacy budget which was spent in Muslim world form the contact with the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It is inadequate fo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s to have further implementations with the affairs of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From an aspect of the human resources, the absolute trained staffs for the requisite of tackling the affairs with the Americans and Arabs and Muslims is inadequate. The suggestion of the Advisory Group is to hire language-qualified personnel and train them with expertise in order to be professional spokesman in formal circumstances. And the language competency of some officials should also be trained broadly and deeply. Except for these primary concerns, the rest are several soft way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launch channels to convey their listeners of US policies, values, and interests during the news and other forms of programs. What's mor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can give the Arabs and Muslims access to the American education, which can exchange the ideas of the students from an early ag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of America, the American publications, even the English teaching, can



influence the Arabs and Muslims a lot. They will know the es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both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ry status.

Operations are necessitated after the suggestions made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cess first begins at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 is the policy director for the whole process. The Advisory Group suggested that “an architecture that can coordinate communications worldwide and adapt to global conditions by directing resources and attention to crisis areas”. Public diplomacy should be suitable for the local conditions, not only in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but also worldwide. After that, a board is need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quantity and adequacy of the public diplomacy and suggestions to the White House.

As discussed above, the reason why this book is a synthetic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olicy makers lies in its specialty. From the factor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 the final process by definite politicians and departments, it is a complete procedur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 diplomacy. The factors aid the government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y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oversee the implementation plans, and monitor the execution of the quantity or allocation of the financial budget as well as other beneficial variables. All in all, the success determ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attitudes toward USA by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All of the process is input, and the output like the views and attitudes of the Arabs and Muslims is the key measurement.

##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Changsong Liu \*

Globalization is the integration of states through increasing contact,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ng a holistic, singl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creasingly binds people together in a common fate. The Globalization started in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when the “new world” was found. An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the cold war coming to an end, it developed so fast. The globalizatio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every state in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It deepens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promote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untries. However, the vast integration also brings many severe problems. For instance, international crime is becoming wilder and the gap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increasing sharply. As a result, some people are against it. But in my opinion, globalization is a tendency which we can't stop for this age.

Regionalization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transaction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

\* Changsong Liu is a freshma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Kai Universi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among a group of countries with a geographic reg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typical examples for regionalism,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APEC and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of these regions vary from one to another. Not only does the cooperation of regionalism in Europe contains economy, it also includ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tegration,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urope. But the impact of some newly-found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NAFTA, still remain to be seen. Above all, regionalization also affects the whole world greatly.

From my own perspective, although regionalization blocks globalization in some way, region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ization and a vital moti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Judging by appearance, many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mplement discrimination economic policy and reject outside countries. But in fact, every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motes globalization when it carries out integration policy. Meanwhile, the contact between integrations and states mak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gions more frequent, which transform every region and state into a part globalization. In conclusion, regionalization accelerates 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 裴 瑶]

### ..... 结构性地区主义与开放性地区主义 .....

地区主义与区域一体化相伴而生。有学者提出, 西欧地区主义表现出“结构性”特征, 而东亚的地区主义则拥有更明显的“开放性”特征。

结构性地区主义指, “地理相邻的地区成员国, 在相互持续关系和合法协定的基础上, 建立某种类型的超国家机制的政治经济共同体”, 这一超国家机制对成员国行为具有强制性与规范性。开放性地区主义指, “在相对明确的地域基础上, 在开放观念的主导下, 以区域(此处的区域不是地理实体, 而是一系列有合作可能性的国家)内部合作为核心, 持续向区域外拓展的地区主义整合”。奉行开放性地区主义的一体化成员国对区域机制建设的意愿往往不高, 而该种机制也呈现出“弱机制化”特点, 对机制的超国家属性与强制性、地区观念的形成都没有很高要求。

资料来源: 仇发华:《结构性地区主义与开放性地区主义——西欧与东亚的比较》,《当代亚太》, 2011年第2期, 第53-67页。

[整理: 姜忆楠]

[责任编辑: 唐铭兴]

## 新春特辑

**【编者按】**又是一年春来到, 日历又翻过了新的一篇, 2015 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不知大家对新的一年有着什么样的期许。在这一期的新春特辑里, 我们为大家预测了 2015 年国际热点事件, 也为大家带来了学长学姐的经验之谈, 更有老师同学对大家的新年寄语。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收获!

### 【2015 国际热点预测】

#### 1. “乌克兰危机”走向?

2014 年美欧俄乌围绕乌克兰危机展开了或紧或弛的争斗, 乌克兰宣布放弃中立地位而向北约靠近的举动引起俄罗斯强烈不满。过去一年来, 有人调侃道, 普京在忙一件事: 乌克兰的事; 欧盟在愁一件事: 乌克兰的事; 美国在玩一件事: 乌克兰的事。从目前的局面来看, 四方力量均有弱点。乌克兰经济接近崩溃, 俄罗斯的高通胀也使其经济陷入水深火热, 美欧以及欧盟内部的对俄政策也无法统一。2015 年, 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大国博弈将继续开展, 不排除爆发大事件的可能, 但也可能获得一时喘息。

##### ➤ 媒体观点

显然, 俄德法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闪电式峰会”虽给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带来一线新的希望, 但由于各方分歧依旧, 化解危机之路仍将漫长。目前, 当务之急是避免冲突和对抗进一步升级, 尽快在乌东部地区实现停火。各方只有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 乌克兰危机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化解。

——《新华网》评论

俄罗斯国际政治鉴定研究所所长明琴科: 乌克兰危机至少还要持续两到三年, 乌国内社会不满正在积聚, 政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由于乌社会高度军事化, 存在很多不受政府控制的准军事组织, 国内战争形势严峻。各地区可能因内部问题发生冲突, 经济崩溃不可避免, 而随后到来的将是社会动荡, 乌国内矛盾已非民族问题, 症结在于社会问题。

——《环球网》评论

#### 2. “伊斯兰国”的威胁将何去何从?

2014 年 6 月, “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伊拉克摩苏尔, 突然冲上全球圣战舞台。2015 年以来, “伊斯兰国”接连斩首两名日本人质和烧死一名被其俘虏的约旦飞行员, 其极端残暴之本性再一次暴露无疑。当前“伊斯兰国”展现出的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值得关注, 其“建国”进程和版图扩张都在不断推进, 暴恐触角向更多国家和地区延伸, 影响力和威胁继续放大。

### ➤ 媒体观点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猖獗，乱上添乱；利比亚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存，世俗民兵与伊斯兰民兵打得不可开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谈再次失败，哈马斯与以色列爆发历时 50 天的惨烈军事冲突，虽然实现停火，但局势仍然紧张，各种小型冲突不断；巴沙尔再次当选叙利亚总统，进一步站稳脚跟，但美仍坚持要其下台，内战仍在继续，“伊斯兰国”的介入更添复杂因素；伊朗核谈判两次延长最后谈判期限，仍未能达成最终协议，并再次延期至明年 6 月 30 日。

——《解放日报》报道

本来，“伊斯兰国”的兴起，乃源于阿拉伯世界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伊斯兰教势力的冲突，以逊尼派为主流的中东国家欲推翻叙利亚的什叶派阿萨德政权，遂支持该国反对派武装力量，包括由阿尔盖达支派衍生的“伊斯兰国”，而美国也有相同目的，但经过近三年惨烈内战，阿萨德政权依然屹立不倒，“伊斯兰国”却壮大成为一头凶残的魔怪，把过去给予支持的逊尼派国家也视为吞噬目标。

——《星岛日报》报道

从当前“伊斯兰国”的发展态势和国际反恐力量的调整步伐看，短期内“伊斯兰国”的威胁可能进一步发酵，并对整个国际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未来，国际社会能否遏制住“伊斯兰国”威胁的继续发酵，短期来看，至少有两点很关键。一是美国牵头组建的国际反恐新联盟能否形成合力。由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无意再次进行全力反恐，国际反恐行动松散乏力。美国虽然牵头组建了有 60 个国家参加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新联盟，但是新反恐联盟的凝聚力明显不足。而欧洲虽然面临的威胁愈发突出，但也只能依靠美国，无力挑起反恐大旗。二是能否派遣地面作战部队进行清剿。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愿意成为一位战争总统，不愿意对其既定的反恐战略收缩做出根本性调整，坚持不向伊拉克派遣地面作战部队，而仅靠空袭不可能击败“伊斯兰国”，最多能够阻止“伊斯兰国”进一步的扩张，无法扭转伊拉克冲突不断恶化的趋势。

——《人民日报》评论

### 3. 巴黎气候大会能达成“历史性”协议吗？

2015 年 12 月，缔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195 个国家将齐赴巴黎。它们的任务是达成一份首次强制规定所有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这份将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远未成为现实。在 2014 年 9 月的纽约气候峰会重燃希望之后，11 月，中国和美国这两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签署了一份双边协议。12 月，利马气候大会本该为巴黎大会作好准备。科学家们预言，到本世纪末的升温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能否实现，成败就在此一举。

### ➤ 媒体观点

大卫·金爵士表示，他对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有信心”。他说：“2015 年的巴黎气候

大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哥本哈根大会。”他认为，欧盟方面的表率作用，以及中美联合声明的发表，让他对各方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协议很有信心。”

——《中国青年报》

#### 4. 伊核谈判前景如何？

2014 年 4 月 9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各国代表出席闭幕会。当日，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第三轮对话会在维也纳结束。2014 年 7 月 20 日前，伊朗与六国应达成全面解决伊核问题最终协议。但因分歧严重，谈判延期至 11 月 24 日。但 11 月各方仍未达成一致，谈判又被延期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 媒体观点

分析人士认为，美伊两国在伊核谈判中占据关键性地位，两国国内政治环境对于谈判结果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伊核谈判阻碍犹存，但一些专家也对谈判前景抱有乐观态度。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研究员菲诺说，美伊两国在此轮谈判中释放出巨大诚意，增进了彼此信任。

——《环球日报》

#### 5. 国际油价变动将牵动政局？

2014 年的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给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以及内外政策产生巨大影响，而 2015 年年初以来国际油价的反弹到底是前景良好还是昙花一现，以及其变动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政局的影响，将引人持续关注。

##### ➤ 媒体观点

现阶段任何的油价反弹都将是短暂的，因为如果油价在短期内的反弹改善了石油企业的经营环境，石油企业一旦决定继续维持甚至增加资本支出，那么原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将会进一步恶化，这将对今年下半年的油价走势带来很大的压力。市场本身具有的调节功能会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

——《文汇报》评论

回顾上一世纪，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曾沉重打击了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经济。1979 年美国 and 伊朗又发生人质危机，苏联趁机入侵阿富汗。这场战争持续 9 年，以苏联落败告终。本世纪初，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出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但历经 13 年，美国连打 2 场败仗，终于在去年年底，继从伊拉克撤兵后，也从阿富汗撤出了作战部队。今日看来，美国步了当年苏联的后尘，这次石油价格下跌尚没有形成石油危机，其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今年将初现端倪。

——《解放日报》评论

## 6. 亚太地区不会风平浪静，地区摩擦在所难免？

亚太地区作为近年来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集中了美、中、日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同时还包括了军事实力强大的美、俄、中三国，各方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2015年亚太地区应该不会平静，中美的竞争与合作仍将发挥重要影响，朝核问题仍待解决，中日关系仍在艰难中寻求缓和，南海和东海等争端也时有发生。而以当前的形势来说，亚太地区爆发大动乱的可能性较小，但摩擦纠纷在所难免。

### ➤ 媒体观点

亚太地区的目前形势已经进入“高危期”或者“亚冲突”状态。在东北亚，朝鲜半岛上剑拔弩张，千钧一发；在东海，日本对中国钓鱼岛的主权挑衅毫无收敛之意，最近反而与台湾方面达成所谓“渔业协定”，其试图松懈瓦解自2012年初以来两岸达成的“保钓默契”之企图明显。在南海方向，美国与菲律宾4月初的联合军演硝烟未落，菲方紧接着就在海上公然抓扣了12名中国渔民，并宣称要对这些渔民进行起诉审判。

——《人民日报》报道

## 7. 埃博拉疫情是否能够置于控制之下，各国间的合作能否进一步展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自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在九个国家发现超过两万个病例，造成近万人死亡。而经济落后、贫富差距过大、政局动荡以及公共卫生条件差是埃博拉疫情爆发的重要原因。2015年，埃博拉疫情将进一步迈入新的阶段，期待被置于可控范围之内，并进一步促进各国合作的展开。

### ➤ 媒体观点

“未雨绸缪彻桑土，御冬旨蓄备桃诸。”如果当初不具备这种全球视野，以为远在天边的病毒与中国关系不大，显然就不能跟上现在的形势。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命运越来越跨越国界和种族，寄托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近年来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包括埃博拉疫情，都在印证这一观点。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解放日报》评论

## 【经验之谈】

### 出国经验

鲁悦\*

出国的念头缘起于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火爆，但囿于当时年幼，想法只停留了约一个暑假。到了高中，帅帅的外教是威尔士的，那性感的英音，duangduang的，猛然想起自己也是有过出国梦的人，顿时立志以后也要去英国讲英语，这个想法持续到下一个菲律宾外教任职前后。可以说正式确立下来这个选项是大二，圈子里开始出现去国外读书和交换的同学，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教学方式生动具体的出现在朋友圈、人人、微博里。喔，大学

\*作者简介：鲁悦，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1级本科生。

的第二年，想出去想出去，大学的第三年，想出去想出去。但是父母让我考公务员的想法萌芽的更早，而且比我出国的想法坚定多了，所以我也妥协了开始上公务员的课，开始看奇奇怪怪的百科知识。但是呢，果然落榜了，毫无悬念的。还好当时做了两手准备，之前已经开始了雅思的备战，也早递交了大学的申请，所以呐落榜的时候也收到了几所大学的 Con-offer，略庆幸这个结果，因为爸妈终于被迫同意我的出国计划了。

可以说我是在考公务员和出国读书之间兜兜转转了两年，最终在国考成绩的鼓励下，毅然决然走上出国的道路。听起来出国出的略不风光，不过也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其实我觉得自己误打误撞的“两手准备”还是蛮合理的，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多做些计划，以应对狭路相逢的变化和变卦。

至于公务员，我相信很多孩子纠结过这个选项吧，不管是父母之命还是自己的选择。我也不例外，甚至对此还展开过一系列美好而不真实的设想。父辈看来，这个职业稳定而有面子，着实棒极了，这点同意，我也不想 30 岁大龄产妇的时候被 Boss 辞掉了。但是，又总是放不下挣大钱赢取高富帅当上 CEO 的伟大理想，所以着实纠结迷茫。可能，几十年后回首当年，会吐槽自己的丰富想象力，但是人就只能从现在走到以后啊，这些阶段跳不过，迷茫，狂妄，冷静，从容，这些都得一二级一级的打怪。现在能做的就是淡定接受自己的每个版本吧，然后时刻别扔自己出发时的任务卡就好。

一切顺利的话，还有四个月就可以展开新生活了，很期待，很紧张，还是很期待。以前一直对申请的学校和专业患得患失，后来想明白一个道理，不一定只有最好的环境里才能长出奇葩，还是最简单的道理，好的坏的都是人为的。最后呢，也是用了大学四年才明白的一个道理，一定要接纳自己，好的坏的都是我的，不是说可以怡然自得继续做你的剩人，而是说在认识和承认自己当前优劣现状的前提下，才能做更好更合适的打算。经过一段相对漫长但绝对有意义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成长，相信一定和现在的你不一样。

## 保研经验（保内）

赵姝婧\*

很多同学希望通过推荐免试成为研究生，但是却不知道从哪些地方着手。就像一年前的自己对于保研一事还非常懵懵懂懂，多亏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们给我指点迷津，给我很多鼓励，再加上自己刚刚经历了这其中的纠结、煎熬，我才对于保研这条路有了逐渐清晰的理解，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学弟学妹们一些启发。

### 1、时间阶段

往年的保研一般在大四开学的第一个月，也就是 9 月份。但实际上由于本校的夏季学期，实际上保研资格面试和名单确定在小学期结束前已经完成。目前已经进入了春季学期，因此有志于保研的同学应当抓紧时间。有志于保送外校的同学可能需要更早关注相关学校

---

\*作者简介：赵姝婧，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2011 级本科生

通知，递交材料，参加夏令营。秋季学期开学后，开始推免系统注册，提交志愿，等待通知。基本到10月底，预录取学校确定，保研一事就尘埃落定了。

## 2、保外保内、学硕专硕

一般来说，保研面试的成绩由80%的学分绩+10%的社会工作+10%的学术研究构成。当最终的面试结果出来之后，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综合排名进行选择，一般来说，排名越靠前越有利。

在我们保研资格面试结束后，本以为保内、保外资格已经确定，但开学前教育部公布了2014年保研改革新方案<sup>①</sup>，主要变化是本年度的推免指标不再区分类型（即获得推免资格的同学可自行选择申报学术型或专业型硕士）；获得推免资格的推荐人选进行网上报名，申报接收院校（即获得推免资格的同学可自行选择申报本校或外校志愿）。

虽然指标名额不再区分学硕、专硕（本专业可选择的主要是法律硕士）、内保、外保，但并不意味着最终录取不区分，因此大家在申报时需要了解自身的保研需求和能力。学硕和专硕之间的区别是前者偏向学术，可以继续深造；而后者偏向应用，以找工作为目的，之后不能继续读博；两者的学费、在校待遇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是偏向于学硕的。因此想要继续深造的同学需要做出一个大致的规划，多多了解一下相应的内容。此外，每种保研类型的难度是不一样的，例如保外学硕因为需要与全国推免生竞争，名额少、难度最大。如果你想保送外校的研究生，那么一定不要错过参加暑期夏令营的机会，尽早准备，有关夏令营的信息可以在各大学校研究生院主页找到。

大家可以和学长学姐多多交流，尽可能多方面了解相应情况，避免选择盲目性。此外，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保研论坛”，里面有很多前辈经验可供参考。

## 3、前期准备

学分绩方面。这主要是在以下两方面。第一，A、C、D学分绩要求在班级前50%，且A、C课程不能有挂科。因此，如果你的学分绩排名还不是特别理想，那就需要好好努力了。第二，A、C两类课程必须修完，D类课只能差3分以内。如果因为出国交流导致学分不够或曾经挂科，就失去了保研资格。

自身综合素质方面。首先，科研创新能力，比如你是否在期刊上面发表了专业性的文章；是否做了百项或国创；是否跟着老师做过项目等。这些都是老师非常看重的。其次，专业素养考察，平时是否对国关专业感兴趣，专业书、专业文章看得多不多，对时事的了解以及知识的积累，这反映了你的学识素养。第三，其他方面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英语水平。实习、实践经历，第二外语，双修经历等，这些虽不是关注重点，但如果在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方面都不错的情况下，就是锦上添花。

## 4、推免过程

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学院主页和研究生院主页的通知，有任何消息都会在这上面发布。

<sup>①</sup> 方案内容详见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261/201408/xxgk\\_172730.htm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261/201408/xxgk_172730.html)



同时,今年教育部开通了推免服务系统,是全国统一的推免工作信息备案公开平台和推免生网上报考录取系统<sup>①</sup>。

保研资格面试主要是询问专业相关的问题。可能涉及到本科期间读过哪些专业经典著作、学年论文有关问题。如果对专业基础知识有些遗忘的话,建议大家在面试之前在回顾一下;同时除了教材之外,强烈建议大家多多阅读专业著作,这样大家对于相关经典理论及其奠基人会有直接的理解。

此外,在面试现场,大家要注意着装,不需正式,但求整洁;面对提问,大家要抱着真诚、谦虚的态度,同时保持自信,注意谈吐。

### 5、为什么选择继续留在南开学习国关

经过本科的学习,我感觉自己对于本专业还是挺感兴趣,有志于继续在国关领域深入学习。南开的国际关系在全国排名靠前,有我非常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也有非常 nice 的老师们。并且可以提前修读本校研究生课程,有志于在研究生阶段出国交流的同学还可以利用保研后的这段宝贵时间,学好英语、夯实专业基础,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做好规划。

虽然我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复试通知,也曾想过去参加复试顺利通过最后潇洒拒绝人大的桥段,但纠结许久,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选择继续留在南开学习。

以上就是我去年的保研之路。总体来说,保研是对三年来自身学习、工作、生活、科研等情况的综合考察。新的一年已经来临,距离 2015 年的保研面试仅有三四个月时间,希望有这方面打算的学弟学妹能够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 保研经验 (保内+保外)

郭晓琼\*

去年九月份,我有幸获得了保研的资格,虽然经历了保研之路,但经验不足,也有很多遗憾的地方。在此写下自己保研的经验,希望能给以后有意向保研的同学提供一些借鉴。

想要保研的同学主要要在两方面进行准备,一方面要获得南开的保研推荐资格;另一方面需要本校或者外校同意以保研的方式接收你读研,以上两件事都获得成功,那么保研也就基本算是成功了。因为我主要选择了保外校,所以主要介绍一下自己保外的经验。

如何获得南开的保研推荐资格?

我们学院去年的政策是通过学分绩排名加面试计算综合成绩,然后对综合成绩进行排名,最后确定谁能获得保研资格。其中综合成绩中学分绩占 70%,科研潜力占 20%,社会工作占 10%。总体来说学分绩排名越靠前越有优势。需要注意的是,获得保研资格的一个条件是 AC 类课全部修完没有挂科,未修完的 D 类课不超过 3 个学分,有 D 类课学分不够的要及时修满。如果在学校有一些科研经历如参加过百项、参加过科研项目或者发表过论

<sup>①</sup> 网址是 <http://yz.chsi.com.cn/tm/>

\*作者简介:郭晓琼,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2011 级本科生。

文等，对于保研也都有帮助。面试时老师会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有关学术方面的，如读过哪些专业书，有关社会工作方面的，有关你未来读研的打算等等。老师也可能对你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获得保研资格的具体操作流程、需要递交哪些材料等在小学期或者九月初学院主页会发布相关信息，有保研意愿的同学要及时关注，安排好自己的日程，避免错过日期或者考试时不能赶回学校。

如何找到接收你读研的学校？

一般来说，各个学校主要通过暑期推免夏令营和十月初的推免考试来选拔学生。各学校的夏令营的招生简章大概在五月初会陆续开始发布，“保研论坛”上会有比较详细的汇总，大家也可以密切关注目标院校的研究生院的网站或者院系的网站。如果想要参加夏令营，要在截止日期前把夏令营申请材料寄到对方学校，一般包括个人陈述、推荐信、申请表以及获奖证书和各种科研证明材料，有的还要求提前撰写一些论文，这些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准备。我们专业同学一般申请的是国关相关专业，包括国际法、国际关系、外交学等等，我申请的是国际传播专业，专硕一般申请的是法律硕士。

各学校暑期推免夏令营的内容各不相同，时间也不一样，如果申请了多个夏令营则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那么则要进行取舍。夏令营的内容一般包括听讲座和笔试面试，可能会包括英文考核，大家可以按照自身的情况进行专业知识或是英文的准备，但是在参加时不一定全部抱着考试的心态，因为参加夏令营的都是各学校选拔出的学生，从中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也能认识很多的朋友。其实，现在很多夏令营不再提供预录取的结果，最多是夏令营中表现优异的同学可以在十月初的推免考试时优先考虑。但是，如果在夏令营中获得了目标院校预录取的资格，在网上操作中则可能面临要求提前确认录取结果，这样就不能参加其他学校的推免考试了。因而新政策下可能面临这样的选择——是遵从夏令营的结果还是参加十月初的推免考试去尝试更多的院校。

至于十月初的推免考试，各学校会在九月份发布章程，大家按照要求网申和邮寄材料即可。考试也分为笔试和面试，只不过推免考试的时间并不像夏令营的时间那么长，也更加严肃和严格。

保研看似是读研的捷径，但是其中面临了许多选择。尤其是保外，各种材料和考试的准备，有许多细节需要重视，过程也很繁琐。但是无疑保研这一过程也会让人学会很多东西。希望有意向保研的同学都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学校。

## 【师生寄语】

祝全体同学健康快乐，学业进步！祝《新视界》再接再厉，越办越好！

——吴志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希望同学们在学问上要做到上中下：上指理论层面，具有较浓厚的理论知识；下指实践方面，多关注社会现实；中指具体的方法，实现理论知识和现实社会的联结。

——季乃礼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中不断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不人云亦云，不亦步亦趋。祝大家收获在南开，快乐在南开。

——刘兴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希望国关的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拥有全球视野的同时关注基层，关注民生，学以致用。

——徐振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感谢同学们的盛意，仅有几句寄语与诸君共勉。亲爱的同学们，我深深地理解，你们耗费了多少时间，战胜了多少困难，才取得了眼前的成绩。新春之际，望诸君“择善人而交，择善书而读，择善言而听，择善行而从。”细细品味并行之，或许会收获很多。

——霍特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老师

蓦然回首，《新视界》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五年来，我们看着她从蹒跚学步到自主创新，在坚持当年张睿壮教授发刊词中所嘱咐的“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的同时，这本由我们南开国关的同学们自筹自办的学生刊物，搭建起了增进校内外、国内外国关学人交流的平台。而作为曾经的一位编辑和主要负责人，每当回想起在编辑部的经历，都铭感于心。点点滴滴，犹在昨日。正是这份经历，不仅让我有机会增强了专业学习和编辑技能，更让我收获了细致、耐心、责任、规范和友谊。在心里，我偏爱地把她视为我在南开收获的第二学位。

值此新春伊始，谨祝福《新视界》在未来办得更好，更加出彩！愿她能成为更多国关学人亲密的小伙伴！在此，也请允许我以曾经的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向一直以来所有关怀、支持、鼓励和批评《新视界》成长的师友致以诚挚的谢意和衷心的祝福，祝愿大家羊年吉顺，安康幸福！

——2013 级国际关系博士生 李金潼

2014，中国和世界见证了一个不平凡的一年；2015，我相信世界会更加精彩；这将是我们的国关学子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读书、观察、思考……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更多。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愿我们和《新视界》一起努力，付出辛劳与汗水，收获成功与快乐！

——2014 级国际关系硕士生 刘志

加入《新视界》将近三年，让我着实感受到坚持用心创作一份学生主导的期刊的不易之处。《新视界》自2008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承“学生第二课堂”的理念，努力传播学术前沿知识，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增添趣味性，解答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关心的实际问题。作为《新视界》的忠实读者，我也发现她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通过编辑部的努力，让《新视界》更受读者喜爱，更加完美！

——2011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于凯玥

2015年，《新视界》五岁了。今天，拿在我们手中这本书，绝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学生刊物，它更象征着多少届南开国关人之间一种精神上的传承。《新视界》是一个正在长大中的孩子，需要我们每一个南开国关人用心呵护、细心培养。新的一年，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坚守当初的那份热爱，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共同努力，把这份刊物办得更好，让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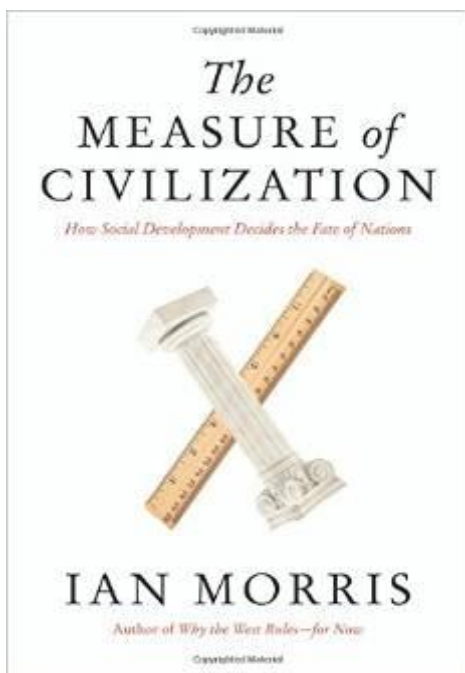
——2012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宁鹏举

[整理：程 康、丁敏潇、江昊宇、李天翼、裴 瑶、杨至远]

[责任编辑：程 康]

## 新书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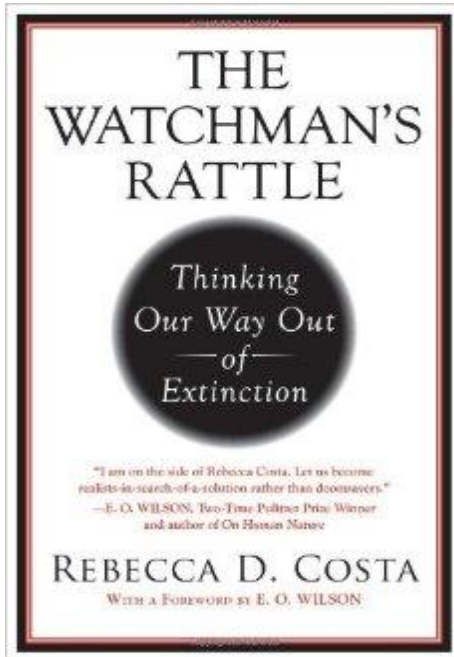
**【编者按】**2015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因刊登讽刺伊斯兰教的漫画,其总部遭到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的恐怖袭击,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文明冲突的讨论在全世界愈演愈烈。正如亨廷顿所言,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各大文明板块间激烈碰撞的差异性,成为导致世界冲突的主要渊源。国际社会将不得不思考:如何协调各大文明的差异性,将文明冲突转化为良性的文明对话;如何协调文化认异感和文化认同感的关系;如何避免言论自由成为导致冲突的导火线。本次新书架将以此为主题,与大家分享与此相关的书籍。



伊恩·莫里斯:《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Ian Morris,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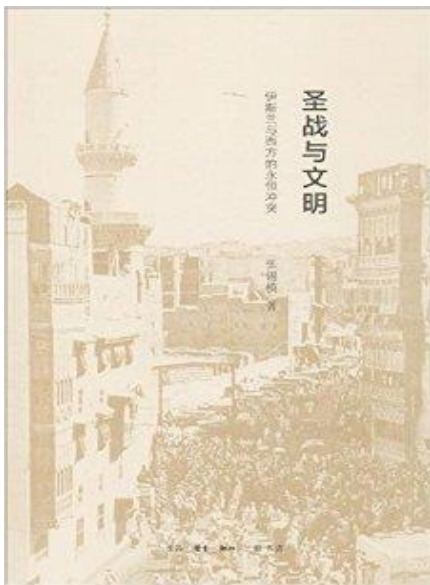
如果说西方文明程度更高,从而主宰世界,那么文明如何界定、如何衡量?文明从哪些方面为其奠定了主导世界的基础?文明将如何决定国家的命运?又将如何决定21世纪的未来?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人们一直为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西方为什么能够拥有巨大的权力而激烈争论。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文明的度量》正是为终结这一争论而作。《文明的度量》横跨15000年的人类漫长发展史,围绕全球文明重心的迁移,就西方何时开始主宰世界等重大问题展开阐述,对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定量描述,以此追寻经济和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进。

在《文明的度量》一书中,莫里斯独创“社会发展指数”,结合考古证据、历史数据、现代社会数据等,从4个特性衡量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进而对上一个冰川世纪结束以来15000年的东西方国家进行全方位扫描,使用突破性的社会发展研究数据对比了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社会发展状况。莫里斯解决了人们对全球发展的几大疑问,而且还提供了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有力工具,总结出我们应该如何思考21世纪,以及为何东方将成为未来的主人。



丽贝卡.D.科斯塔:《守望者的喋喋不休:从灭绝中思考出路》,纽约:先锋出版社,2012年。(Rebecca D.Costa, *The Watchman's Rattle: Thinking Our Way Out of Extinction*,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2012.)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发令人不安的世界。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到悬而未决的核武器问题,从日益严峻的资源紧缺,到教育失败的未​​来隐患,人类几乎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阻止这些问题的恶化。很多人开始怀疑,有些问题人类是否根本无法解决?现代文明是否将在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中走到尽头?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前沿学者丽贝卡.D.科斯塔在《即将崩溃的文明》一书中勇敢地探索了现代文明中的人们如何应对社会可能崩溃的前景。她通过对玛雅、高棉和罗马帝国兴衰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在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往往满足于权宜之计,而不是寻找治本之道。这种“鸵鸟政策”代代相沿,浪费了问题解决的最佳时机。当全社会的问题恶化到无法解决时,文明的崩溃指日可待。为了避免文明的崩溃,我们首先应该超越阻碍人类寻找治本之道的根本性因素——非理性反对、指责个人、假关联、筒仓式思维和极端经济学等五大超级文化基因。在审视传统思维习惯的同时,我们应该努力发展洞见式思维,在非理性的社会中寻找理性的解决方案。



张锡模:《圣战与文明:伊斯兰与西方的永恒冲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圣战与文明:伊斯兰与西方的永恒冲突》为作者生前计划写作的《伊斯兰与世界政治》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三部曲由于作者去世最终未完成)。作者以伊斯兰的兴起、发展、衰落、转变为叙事线索,借助各个不同时代国际政治体系、权力斗争格局、东西方交流冲突形势的演变,透彻说明伊斯兰的兴衰与世界政治的紧密关系,以及伊斯兰与世界政治的深刻互动影响。作者娓娓道来,向读者表明了伊斯兰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背景,从而为人们了解今日世界伊斯兰问题的由来,打开了一扇宽阔的窗口。并为人们预测伊斯兰世界的前景,提供了若干宝贵的线索。





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讲述了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讨论的主题。在轰轰烈烈地讨论“洋为中用”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洋”究竟是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法治”,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诞生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会把西方文明带到哪里?可以想象一幅今天的地图,西端是美国,东端是俄罗斯。

追求个人自由的强度西高东低的倾斜;追求人人平等的强度东高西低的倾斜;交叉点在英、法之间。过去百年来,西风逐渐压倒东风,自由压倒平等。东西之别可以通过追溯文化基因如何结合了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背景与契机去解释。从西班牙到法国、到英国,再到美国的霸权交替,都是约130年的周期,分起、承、转、衰四个阶段,也就是四代人。美国之后,霸权归谁?中国应如何选择自己的角色与命运?



吴小坤:《自由的轨迹:近代英国表达自由思想的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该书选取表达自由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借鉴发生学的方法,以传播学的角度为切入,对英国近代表达自由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在此过程中关注这一思想形成的内在动因。研究认为,建立在古典道德观和哲学基础之上的表达自由基本原则,对近代以后表达自由观形成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关于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传统被重新探讨并不断受到反思与质疑;国王“神圣权力”与个人“天赋人权”在表达权利上相互渗透与冲突,促使表达自由不断朝向要求规范化的制度

基础和保障的方向发展。研究旨在改变过去对表达自由思想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将表达自由思想置于近代英国社会主导结构的变革以及话语博弈的双重维度中考察,论证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从制度的层面建构了权力、知识、出版之间的关联,而推动其思想内涵转变的恰是基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差异。

[整理:姚丽丽、江昊宇]

[责任编辑:江昊宇]

## ♣学术交流♣

### “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研讨会召开

(政府学院网站新闻) 2014 年 12 月 7 日, 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主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研讨会于爱大会馆召开。共有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天津社科院、天津市发改委、天津市合作交流办、天津市交委、天津市国土资源与住房管理局、天津市武清区、天津滨海新区、北京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的约 40 名专家和领导出席本次会议, 就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由周恩来政府学院副院长孙涛教授主持。吴志成院长首先致欢迎词。接下来, 北京大学秘书长杨开忠教授、天津市发改委副局级巡视员李嘉森、天津市合作交流办环渤海处处长崔峥嵘、武清区书



记张勇、天津市交委总经济师杨树海、天津市国土资源与住房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金丽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郝寿义等专家分别就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规划、战略定位、区域合作、交通设施、空间规划布局等问题发表意见。最后, 与会专家和代表就京津冀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

本次会议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召开的。2014 年 2 月 26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 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根据中央的指示, 设立了应急管理项目“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 委托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交通部公路研究院、北京市发改委研究所等机构开展联合课题研究, 我院孙兵老师承担其中的“京津冀一体化组织和管理机制研究”课题。为了保障课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课题组决定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主办本次“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研讨会, 邀请有关专家就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进行研讨。

### 普罗迪做客周恩来论坛

(转自南开新闻网)1 月 28 日,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我校名誉教授罗马诺·普罗迪访问南开并做客周恩来论坛。校党委书记薛进文、校长龚克分别会见了普罗迪



一行。薛进文向普罗迪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向普罗迪介绍了南开的学科发展近况。他说,普罗迪先生不仅是欧洲政界的常青树,也是南开很有人气的教授,每一次到南开所作的讲座在同学们中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希望今后继续推动南开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相关学科方向间的交流。



龚克感谢普罗迪对南开大学的发展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并与他交换了对“新丝绸之路”的看法。龚克说,普罗迪先生是南开的老朋友,为促进双方的交流合作做出了诸多贡献,希望今后常来南开讲学,为这里的师生传道授业,并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友好交往。普罗迪表示,南开大学有着优良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除在经济和商学领域有着雄厚的实力以外,在国际关系特别是欧洲问题研究上成绩也十分突出。他表示将一直关注南开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并建议在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研究等领域与南开继续开展合作。

普罗迪还作客“周恩来论坛”,围绕“新丝绸之路”为南开师生及留学生带来了专题讲座。讲座由龚克主持。

## ♣校外短讯♣

### 北京大学

●2014年12月2日至3日,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提供合作的首届“北阁对话”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参加对话的人士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等11位外国前政要、战略家,以及国内相关领域一些智库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前国务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戴秉国参加了这次对话。

●2014年12月19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举行“国关风云”系列形势报告会。本次报告邀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主讲,题目是《一带一路与中国国际经济新战略的展开》。校内外200余名学生、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2014年12月26日下午,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举办的高端论坛“博雅非洲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开幕并举行了第一次论坛,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添、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冯勇处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等共90人全程参加了开幕式及论坛。会议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刘海方博士主持。

●2015年1月21日上午,《谁掌控美国的战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史

(1942—1991 年)》、《美军眼里的中国军队——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研究报告》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C105 室举行。会议主题为“美军战略规划与对华军事评估”，由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主办。

●2015 年 2 月 4 日至 6 日，贾庆国院长率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陈绍锋副教授、雷少华博士、节大磊博士和五名博硕士生赴日本东京大学参加由该院和东京大学法政学院联合举办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学术研讨会。日方代表团包括东京大学法政学院藤原归一教授、高原明生教授和松田康博教授等人。

#### 清华大学

●2014 年 12 月 13 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举办了“21 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国内顶尖学术机构的 21 位著名政治学家与会，共商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共有来自国内外高校的 200 多人共襄盛举，是一次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众多领域的学者参与的历史性学术盛会。

●2015 年 1 月 21 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在明斋 315 室举行工作会议，对过去的一年工作进行总结并讨论 2015 年的工作内容。会议由中心主任张利华教授主持，中心理事会主席郑燕康教授、副主席史志钦教授，特约研究员江时学、田德文、郇庆治、房乐宪、漆海霞、袁帅出席了会议。

#### 复旦大学

●2014 年 11 月 16 日，由上海市国际

关系学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青年国际问题学者论坛——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

●2014 年 12 月 19 日上午，丹麦奥尔堡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李彤教授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做了题为“理解主导权和全球秩序背后的辩证逻辑：正在崛起的大国以及新兴的世界秩序”的讲座。国际政治系潘忠岐教授主持，多名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2015 年 1 月 14 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北大、复旦、吉大、中大“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复旦国家治理战略报告发布会在复旦大学文科楼 725 室举行。十余位驻沪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国家治理这个专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学术讨论。

#### 中国人民大学

●2014 年 18 日至 22 日，陈岳院长率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代表团赴台湾政治大学出席第十届“两岸和平研究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主题是“服务贸易协定争议之后的两岸关系与东亚情势变迁”。该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共同发起和举办的年度论坛，分别在大陆和台湾轮流主办，目前已举办过十届。该论坛目前已成为两岸学术交流和政策交流的重要平台。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2 点，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林德山研究员应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闫瑾老师邀请,在明德新闻楼 0407 教室为人大国际关系学院 30 余位学生做关于“欧洲政党与社会思潮”的学术讲座。

●2015年1月3日至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协办,人民网独家报道的“中

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 2015”在明德国际楼 408 成功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已经走过十一个年头,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动之一,在学界享有良好的口碑,并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整理:程康、李安琪]

[责任编辑:李安琪]

### .....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 .....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是美国著名印度裔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其著作《从财富到权力》一书中构建的一种现实主义模型,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作者对于古典现实主义和防御型现实主义的一种修正理论。

与古典现实主义相比较,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保留了‘能力塑造意图’的逻辑”,但是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认为至关重要的能力应当是政府能力而不是整个国家的能力,一个国家的对外扩张来自于外交政策,来自于核心决策者,核心决策者利用政府力量这一部分国家力量来实现其意图。所以,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认为政府的结构、范围和能力是驱使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活跃表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与防御型现实主义相比较,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在概念定义上更加精准,实用性也优于防御型现实主义,防御型现实主义认为威胁是导致一个国家扩张海外利益的主要甚至唯一因素,但关键就在于这个“威胁”的定义具有很大的收缩性,什么才能叫做“威胁”?多大程度的“威胁”才会导致扩张行为?相比之下,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就不存在这种定义上的缺陷,这种理论模型将政府能力而非威胁作为推动国家扩张行为的主要因素。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防御型现实主义只是“说明世界应该如何运行”,而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则是“解释世界是如何运行的”。

资料来源:法里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12页。

[整理:唐铭兴]

[责任编辑:唐铭兴]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2 月)

(文章按照第一作者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相同作者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同一作者发表多篇文章时, 只做一次介绍。)

### 1. 韩召颖、田光强: 《塔利班倒台后印度对阿富汗援助评析》, 《现代国际关系》, 2014 年第 10 期。

**摘要:** 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大国抱负等战略因素, 印度在塔利班政权倒台之后不断扩大对阿富汗的援助规模。印度对阿援助具有鲜明的特点,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阿富汗重建和民主化进程。但是, 印度对阿援助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阿富汗动荡不安的局势、印巴之间的相互猜疑以及美国的主导地位。这些因素的制约作用将会逐渐弱化, 印度对阿援助将会持续加大。虽然印度将加大对阿军事援助, 但其援助政策仍将以软实力战略为主。

**关键词:** 印度; 阿富汗; 软实力战略; 南亚; 国际援助

**作者简介:** 韩召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田光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 2. 韩召颖、田光强: 《“全球摇摆国家”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6 期。

**摘要:** 在自身实力不断衰落的情况下, 美国想借助于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国家以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由此美国学界提出了“全球摇摆国家”这一概念。所谓“全球摇摆国家”, 主要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四国, 其主要特征是, 强大且快速增长的经济; 在一个或多个地区占据中心地位; 民主政体以及希望改革国际秩序, 但并不寻求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美国企图在适当满足其变革诉求的基础上, 使其坚定地支持现存国际秩序。这是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然而, 顺应大多数国家的诉求, 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以使其更公正合理, 才是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 国际秩序; 美国霸权地位; “全球摇摆国家”

### 3. 韩召颖、袁伟华: 《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9 期。

**摘要:** 大国之间因实力此消彼长而引发权力转移, 对此国际关系学界有诸多阐释, 但对权力和平转移仍未有圆满解答。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引入国家意志制衡的概念, 由此可以发现, 影响权力和平转移的关键因素是主导国与崛起国间的国家意志较量。

历史上,权力和平转移的例子并不多见,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的和平解决是英美之间在拉美地区权力和平转移的典型案列,而国家意志制衡是考察这一历史过程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 权力转移; 国家意志制衡; 委内瑞拉危机; 拉美地区秩序

作者简介: 袁伟华, 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4. 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

**摘要:** 美国在全球各地区数量众多的正式和非正式盟友对于美国维持主导地位 and 推进其全球战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促使盟友采取美国所期望的特定立场、政策和行动,美国长期以来利用说服、诱导或强迫等多种手段进行协调,强化对联盟的管理和控制,从而实现霸权护持和防范潜在对手的总体目标。面对中国实力崛起和地区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实施联盟管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与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中国在勉力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应促使美国在争端中管控好自身盟友,同时与美国的众多盟友建立更加稳定而紧密的双边利益纽带,避免受到美国联盟管理的干扰和冲击。

**关键词:** 美国; 霸权护持; 联盟管理;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5. 吴志成:《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的影响》,《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

**摘要:** 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加剧不仅进一步激化了俄乌之间的既有矛盾,牵动着国际社会尤其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紧张神经,美欧与俄罗斯的博弈较量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尽管2014年10月16日至17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欧洲大国领导人积极磋商,寻求危机解决方案,俄乌两国也就天然气供应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但在当前形势下依然很难明确判断危机发展的前景。对此,有人认为,这是欧洲大陆继冷战后出现的最严重的危机,可能导致新“冷战”的爆发;也有人断言,此次危机将使东西方世界面临新的战略定位和格局调整。就乌克兰危机本身的复杂性来看,其发展走向与最终结局在短时期内确实还不明朗,但它对欧洲秩序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在目前形势下,俄乌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并未消除,俄美、俄欧关系也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冷淡,但是欧洲地区不会重蹈冷战覆辙。那么,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究竟有何影响?

**关键词:** 乌克兰危机; 欧洲秩序; 美俄关系

作者简介: 吴志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6. 徐振伟:《世界粮食危机与中东北非动荡》,《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摘要:** 世界粮食危机不仅波及了中东北非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引起了主要粮食进口国的经

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埃及作为中东北非地区的主要粮食进口国受到世界粮食危机的影响，国内物价高涨，经济陷入危机，民众为了发泄不满情绪诉诸街头政治，社会陷入动荡。虽然埃及后期的民主改革要求得到满足，也无法平息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和世界粮食危机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埃及的社会动荡对作为粮食消费大国的中国的粮食安全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必须重视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保证社会稳定不受到粮食问题的影响。

**关键词：**世界粮食危机；社会动荡；埃及；中国

作者简介：徐振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7. 杨雷：《中俄天然气合作的历程与前景》，《欧亚经济》，2014年第5期。**

**摘要：**中俄天然气合作自年启动，历经年后终于签署正式合同。在双方价格分歧的背后有很多原因，如俄罗斯政府对能源资源领域高度重视，不断加强国家控制；俄罗斯东北亚区域能源政策存在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东北亚地区在能源供需结构上存在一系列问题俄罗斯对与中国开展能源合作有策略上的考虑。此外，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缺乏和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观念束缚等也制约着两国合作的深入。尽管存在诸多阻碍因素，但中俄天然气合作在乌克兰危机后终于尘埃落定。从长期来看，中俄天然气合作前景乐观。

**关键词：**俄罗斯；中国；能源合作；天然气

作者简介：杨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8. 赵龙跃：《全球化新趋势下的中国国家治理》，《国家治理》，2014年第10期。**

**摘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我国在新时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遵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驾驭日趋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

**关键词：**国际社会；全球治理；治理能力；政府管理机制

作者简介：赵龙跃，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电子论文篇目信息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

1. 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第4-33+156页。
2. 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第34-49+156-157页。
3. 庄嘉颖、郝拓德、方鹿敏、鲍磊翔：《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以东亚双边争端

为例》，第 50-74+157-158 页。

4. 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第 75-86+158 页。
5. 杨雪冬：《论国际因素的合法化机制——以地方治理创新为例》，第 87-107+158-159 页。
6. 王鸣鸣：《奥巴马主义:内涵、缘起与前景》，第 108-128+159-160 页。
7. 刘玮：《国内政治与货币国际化——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国际化的微观基础》，第 129-155+160 页。

#### 2014年第10期

1. 盛斌、果婷：《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博弈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第 4-21+154 页。
2. 王玉主：《显性的双框架与隐性的双中心——冷和平时期的亚太区域合作》，第 22-39+155 页。
3. 李少军：《论国际安全关系》，第 40-55+156 页。
4. 迟永：《美国介入领土争端的行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第 56-80+156-157 页。
5. 刘卫东：《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再平衡战略论析》，第 81-97+157-158 页。
6. 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第 98-116+158-159 页。
7. 郭延军：《权力流散与利益分享——湄公河水电开发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第 117-135+159 页。
8. 查雯：《国家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动员:国内制度与大众参与》，第 136-153+160 页。

#### 2014年第11期

1. 李向阳：《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第 4-17+155 页。
2. 李晓、李俊久：《美元体系内的东亚权力转移:性质及前景》，第 18-51+156 页。
3. 董青岭：《多元合作主义与网络安全治理》，第 52-72+156-157 页。
4. 任琳：《网络空间战略互动与决策逻辑》，第 73-90+157-158 页。
5. 张茗：《区域间治理模式论析》，第 91-120+158-159 页。
6. 马亚华、冯春萍：《空间视角下的东亚权力分布——一种基于引力模型比较静态分析》，第 121-134+159-160 页。
7. 赵可金：《嵌入式外交:对中国城市外交的一种理论解释》，第 135-154+160 页。

#### 《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

1. 杨原：《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第 4-50+157 页。
2. 王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第 51-75+157-158 页。
3. 刘卫东：《美国对美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应对》，第 76-94+158-159 页。
4. 赵卫华：《中越南海争端解决模式探索——基于区域外大国因素与国际法作用的分析》，

第 69-100 页。

5. 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第 120-139+159-160 页。
6. 竭仁贵:《认知、预期、互动与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基于中国自我克制视角下的分析》,第 140-156+160 页。

#### 2014 年第 6 期

1. 李巍:《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第 4-30+156 页。
2. 项卫星、王冠楠:《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美国汇率政治的制约》,第 31-51+156-157 页。
3. 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第 52-72+157 页。
4. 冯维江:《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第 73-98+157-158 页。
5. 詹德斌:《韩国国内在加入 TPP 问题上的争论及选择》,第 99-116+158 页。
6. 东艳、张琳:《美国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框架下的竞争中立原则分析》,第 117-131+158-159 页。
7. 贾力楠:《东盟冲突管理方式:概念、挑战与变革》,第 132-155+159 页。

#### 《国际观察》2015 年第 1 期

1. 俞正樑:《积极进取 引领亚洲 全球再平衡——2014 年中国外交》,第 1-17 页。
2. 贾庆国:《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第 18-24 页。
3. 门洪华:《建构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框架》,第 25-36 页。
4. 周峰:《“#3.0 时代”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第 37-48 页。
5. 徐万胜:《日本第 47 届众议院选举及政局走向》,第 49-59 页。
6. 李秀石:《安倍内阁“重启”日本宇宙战略——从和平研发技术到“军事利用宇宙”的演变》,第 60-74 页。
7. 姜龙范、王海凡:《安倍第二任期日朝关系新变化探析》,第 75-86 页。
8. 高兰:《突破“72 年体制” 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的新型中日关系》,第 87-98 页。
9. 黄正多、李燕:《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多边外交的战略选择与体系构建》,第 99-111 页。
10. 张卫彬:《中印领土西段边界争端中的证据分量问题——基于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判案证据规则视角》,第 112-123 页。
11. 张金平:《“伊斯兰国”突起及西亚北非恐怖活动的变化》,第 124-137 页。
12. 严俊、俞国斌、孙铭建:《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的逻辑:博弈分析的视角》,第 138-152 页。

####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

1. 宋德星:《国家意志与大国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第 1-15 页。
2. 钟飞腾:《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中国的新亚洲战略》,第 16-39 页。



3. 李志永:《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第40-58页。
4. 韩长青、吴文成:《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万斯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第59-89页。
5. 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90-106页。
6. 李恒阳:《“斯诺登事件”与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第107-124页。
7. 邢悦、李智珩:《“韩流”:韩国政府对华公共外交论析》,第125-139页。
8. 周玉渊:《未来中美关系互动中的共识与分歧——中美中青年学者第二轮战略对话会议综述》,第140-156页。

#### 2015年第1期

1. 陈拯:《金砖国家与“保护的责任”》,第1-26页。
2. 李巍、朱红宇:《货币伙伴外交与人民币崛起的战略支点国》,第27-54页。
3. 高尚涛:《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进程分析》,第55-68页。
4. 樊吉社:《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第69-86页。
5. 王栋、尹承志:《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与美国大战略》,第87-112页。
6.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第113-135页。
7. 李因才:《“联合国中长期选举援助及其功效分析”》,第136-155页。

#### 《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

1. 季志业、王鸿刚、孙茹:《太平洋足够宽广——关于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思考》,第1-9+63页。
2. 王世达:《巴基斯坦政局动荡及其前景分析》,第10-15+44+63页。
3. 韩召颖、田光强:《塔利班倒台后印度对阿富汗援助评析》,第16-23页。
4. 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第24-30+63-64页。
5. 刁大明:《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第31-37页。
6. 郭春梅:《中国在澳投资受阻的原因及其启示》,第38-44页。
7. 牛新春:《历史的悲剧:自由主义的困境》,第45-52+62+64页。
8. 黄大慧:《安倍政府缘何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第53-54页。
9. 朱锋:《中日关系还可以改善吗?》,第55-56页。
10. 刘军红:《中日关系的经济学分析》,第56-59页。
11. 胡继平:《稳定中日关系必须克服四大障碍》,第59-60页。
12. 林利民:《中日之间的“战略神经战”将是另一场持久战》,第61-62页。

#### 《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1. 王毅:《盘点2014:中国外交丰收之年》,第1-10+138-139页。
2. 刘振民:《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第11-16+139页。
3. 杨洁勉:《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的探索创新》,第17-28+139-140页。
4. 沈本秋:《大数据与公共外交变革》,第29-42页。

5. 时宏远:《日趋活跃的印度公共外交》,第 43-57 页。
6. 甄炳禧:《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的政策选择》,第 58-74 页。
7. 唐国强、王震宇:《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与优先任务》,第 75-87+140 页。
8. 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第 88-99 页。
9. 郭培清、董利民:《北极经济理事会:不确定的未来》,第 100-113 页。
10. 王联合:《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识、影响与问题》,第 114-128 页。
11. 陈须隆、朱中博:《2014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纪要》,第 129-131 页。
12. 步少华:《“乌克兰危机、欧洲形势与中欧关系”研讨会综述》,第 132-134 页。
13. 赵卫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概念、新举措”研讨会综述》,第 135-137 页。

### 《美国研究》2014 年第 3 期

1. 张业亮:《美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的国际政治分析》,第 9-38+5 页。
2. 孙哲、石岩:《美国外资监管政治:机制变革及特点分析(1973~2013)》,第 39-57+6 页。
3. 杨悦:《“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的对比分析——政治过程理论视角》,第 58-79+6-7 页。
4. 唐慧云:《美国非法移民立法改革与利益集团因素研究》,第 80-96+7 页。
5. 刘国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的挑战》,第 97-102 页。
6. 鲁哈娜、钟丽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及其对区域关系的影响——从东盟的视角分析》,第 103-108 页。
7. 赵明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失速”了吗?》,第 109-114 页。
8. 李庆四:《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下的东亚地区格局》,第 115-117 页。
9. 牛军:《〈剑桥冷战史〉评介》,第 118-128 页。

### 2014 年第 4 期

1. 何奇松:《美国的卫星出口管制改革》,第 9-31+5 页。
2. 李春顶:《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战略》,第 32-42+5-6 页。
3. 韩克敌:《美国学界政界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与思考》,第 43-67+6 页。
4. 何维保:《再论〈旧金山对日和约〉关于西沙、南沙群岛的规定及影响》,第 68-89+6-7 页。
5. 李庆成:《钓鱼岛争端初起时的台美交涉》,第 90-111+7 页。
6. 王玮:《战争冲动、社会约束与武力的使用——美国的经历》,第 112-124+7-8 页。
7. 仇朝兵:《“中国、美国与东南亚:竞争与合作”研讨会综述》,第 125-128 页。

### 2014 年第 5 期

1. 傅莹:《中美要培养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的意识和能力——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

上的讲话》，第9-12页。

2. 刘建飞：《中国外部环境建设中的中美关系》，第13-22+5页。
3. 孔祥永：《希望与恐惧：美国人口的悖论》，第23-43+5-6页。
4. 牛大勇：《中美解冻关系时对日本问题的考量与角力》，第44-59+6-7页。
5. 陈长伟：《冷战与自由——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旅行限制与新闻采访自由的碰撞》，第60-78+7页。
6. 李潜虞：《试论美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政策》，第79-96+7-8页。
7. 刘磊：《“抵消战略”与卡特时期美国核战略的延续与变化》，第97-111+8页。
8. 杨卫东：《美国对外政策传统的第四种解读——评亨利·诺的〈保守国际主义〉》，第112-121页。
9. 刘辉、刁大明、李墨：《“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研讨会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综述》，第122-128页。

#### 2014年第6期

1. 蔡昉：《中国崛起与“修昔底德效应”》，第9-10页。
2. 张蕴岭：《东北亚格局的新历史重构与美国》，第11-13页。
3. 黄仁伟：《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与美国霸权》，第13-14页。
4. 杨洁勉：《近年来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第15-16页。
5. 李向阳：《东北亚的大国关系与合作前景》，第16-17页。
6. 吴心伯：《从奥巴马的弱势看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第18-19页。
7. 陶文钊：《管控好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第20-24页。
8. 刁大明：《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与新一届国会对华政策走向》，第25-50+5-6页。
9. 信强：《“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第51-68+6-7页。
10. 潘锐、娄亚萍：《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与可行性》，第69-79+7页。
11. 张新平、杨荣国：《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影响》，第101-117+8页。
12. 仇朝兵：《“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最新进展及未来发展前景”研讨会综述》，第118-122页。
13. 鲁迪秋：《“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与治理”研讨会综述》，第122-125页。

#### 《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5期

1. 王联：《试析冷战后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态势》，第9-20+5页。
2. 赵可金、尚文琦：《公司外交：对跨国公司外交职能的一项研究》，第21-38+5-6页。
3. 李扬帆：《未完成的国家：“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第39-63+6-7页。
4. 陈长伟：《中美关系解冻前夕台湾对美宣传与游说研究》，第64-85+7页。
5. 杨恕、李捷：《我国分裂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第86-103+7-8页。

6. 本刊特约记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近况与实践——李滨教授访谈》,第 104-120 页。

7. 沈晓雷:《“农业国际合作与非洲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机遇和挑战”会议综述》,第 121-128 页。

#### 《欧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1. 孔寒冰:《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的互利与互动及其前景》,第 1-11+165 页。

2. 尚宇红、高运胜:《维谢格拉德四国入盟十年对欧盟市场出口绩效分析——基于 CMSA 模型的实证研究》,第 12-29+5 页。

3. 孔田平:《试论欧盟扩大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影响》,第 30-48+6 页。

4. 刘作奎:《“深化”还是“扩大”?——东扩十年欧洲一体化走向分析(2004-2014 年)》,第 49-62+6 页。

5. 赵柯:《试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第 63-75+6 页。

6. 张晓通:《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第 76-87+7 页。

7. 王宏禹:《欧盟经济外交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第 88-99+7 页。

8. 葛建廷:《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第 100-111+7-8 页。

9. 宋黎磊、卞清:《新媒体时代公共外交的特征与实践——基于外交部欧洲司官方微博的案例分析》,第 112-129+8 页。

10. 张磊:《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探析——“欧洲选举”还是“次等国内选举”?》,第 130-153+8 页。

#### 2014 年第 5 期

1. 赵晨:《并未反转的全球治理——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域性的关系》,第 1-13+165 页。

2. 高奇琦:《民族区域与共同体:欧洲转型的两个阶段》,第 33-50+6 页。

3. 贾文华:《“次等选举”的右倾化——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影响》,第 51-70+6 页。

4. 戴轶尘:《欧盟新中亚战略中的规范性外交及其软化态势》,第 71-88+6-7 页。

5. 杨继梅、周茂荣:《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溢出效应分析》,第 89-105+7 页。

6. 刘盾、施祖麟、林玳玳:《对欧债危机的根源和治理的另一种解读与反思——工资政策转变的视角》,第 106-127+7-8 页。

7. 田德文:《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转型——由“充分就业”到“促进就业”》,第 128-142+8 页。

8. 李明明:《拒绝融入欧洲?——瑞士的欧洲政策探析》,第 143-154+8 页。

**2014年第6期**

1. 黄平:《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的影响》,第1-2+156页。
2. 冯绍雷:《乌克兰危机长期延续的原因和影响》,第2-6页。
3. 王湘穗:《地缘政治与币缘政治的交织——解读乌克兰危机的双重视角》,第7-11页。
4. 邢广程:《乌克兰内战与大国博弈》,第11-15页。
5. 丁一凡:《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第16-19页。
6. 阮宗泽:《欧洲的安全模式为什么会失败?》,第19-22页。
7. 吴志成:《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的影响》,第22-27页。
8. 冯仲平:《欧盟需调整对俄战略思路》,第27-30页。
9. 朱晓中:《影响中东欧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立场的若干因素》,第30-37页。
10. 张弘:《融入欧洲一体化与乌克兰危机》,第37-42页。
11. 陈新:《欧洲一体化与乌克兰的道路选择》,第43-58+156-157页。
12. 周明:《乌克兰-欧盟联系国协定与乌克兰危机》,第59-81+157页。
13. 富景筠:《“页岩气革命”、“乌克兰危机”与俄欧能源关系——对天然气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分析》,第82-98+157-158页。
14. 李靖堃:《“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欧盟的双重民主建构》,第99-118+158页。
15. 郭灵凤:《欧盟社会保障政策的社会投资转向:理念发展与政策评估》,第119-128+158-159页。
16. 李昕蕾、宋天阳:《跨国城市网络的实验主义治理研究——以欧洲跨国城市网络中的气候治理为例》,第129-148+159页。

**《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4期**

1. 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第1-35页。
2.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改革课题组:《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机制》,第36-63页。
3. 崔立如:《中国外交面临命运共同体中的竞争——对<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机制>的评述》,第64-68页。
4. 贾庆国:《中国外交改革创新任重道远——对<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机制>的评述》,第69-73页。
5. 山本美智子、张玮:《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的量化分析》,第74-110页。
6. 徐秀军:《学科史视域下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114-145页。

##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1

1. David B. Carter and Randall W. Stone, "Democrac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Case of Vote Buy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pp. 1-33.
2. Cristina Bodea and Raymond Hicks, "Price Stability and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Discipline, Credibility,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p. 35-61.
3. Paul Poast, "Central Banks at War," pp. 63-95.
4. Elena V. McLean, "Multilateral Aid and Domestic Economic Interests," pp. 97-130.
5. Navin A. Bapat and Bo Ram Kwon, "When Are Sanctions Effective? A Bargaining and Enforcement Framework," pp. 131-162.
6. Jeff D. Colgan and Jessica L.P. Weeks, "Revolution, Personalist Dictatorship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163-194.
7. Joakim Kreutz, "Human Rights, Geostrategy, and EU Foreign Policy, 1989–2008," pp. 195-217.
8. David H. Bearce, Cody D. Eldredge and Brandy J. Jolliff, "Do Finite Duration Provisions Reduce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Delay?," pp.219-239.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8, No. 4

1. Michael Saward, "Shape-Shifting Representation," pp. 723-736.
2. Lisa Hultman, Jacob Kathman and Megan Shannon, "Beyond Keeping Peace: United Nations Effectiveness in the Midst of Fighting," pp. 737-753.
3. William G. Jacoby, "Is There a Culture War? Conflicting Value Structures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p. 754-771.
4. Dana Jalbert Stauffer, "Tocqueville on the Modern Moral Situation: Demo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Devotion," pp. 772-782.
5. Ismail K. White, Chryl N. Laird and Troy D. Allen, "Selling Out?: The Politics of Navigating Conflicts between Racial Group Interest and Self-interest," pp. 783-800.
6. John F. Mccauley,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Africa," pp. 801-816.
7. Sebastian Schmidt,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and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A Pragmatist Explanation of Norm Change," pp. 817-829.
8. Alexander I. Orwin, "Can Humankind Deliberate on a Global Scale? Alfarabi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Inhabited World," pp. 830-839.
9. Jason Barabas, Jennifer Jerit, William Pollock and Carlisle Rainey, "The

Quest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pp. 840-855.

10. Steven Klein, “‘Fit to Enter the World’: Hannah Arendt 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pp. 856-869.

11. Lorenzo De Sio and Till Weber, “Issue Yield: A Model of Party Strategy in Multidimensional Space,” pp. 870-885.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No. 1***

1. Nicolas Guilhot, “Portrait of the realist as a historian: On anti-whiggism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26.

2. Cynthia Weber, “Why is there no Queer International Theory?,” pp. 27-51.

3. Alejandro M. Peña, “Governing differentiation: On standardisation as political steering,” pp. 52-75.

4. Cemal Burak Tansel, “Deafening silence? Marxism,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he spectre of Eurocentrism,” pp. 76-100.

5. Mark Langan, “Budget support and Africa–European Union relations: Free market reform and neo-colonialism?,” pp. 101-121.

6. Linus Hagström, “The ‘abnormal’ state: Identity, norm/exception and Japan,” pp. 122-145.

7. Diogo Pinheiro, Jeffrey M. Chwieroth, and Alexander Hicks, “Do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hibit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146-170.

8. J. Samuel Barkin, “Racing all over the place: A dispers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mpetition,” pp. 171-193.

9. J.C. Sharman, “War, selection, and micro-states: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p. 194-214.

10. Tine Hanrieder, “The path-dependent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ederalism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p. 215-239.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3***

1. Jon R. Lindsay, “The Impact of China on Cybersecurity: Fiction and Friction,” pp. 7-47.

2. Sebastian Rosato, “The Inscrutable Intentions of Great Powers,” pp. 48-88.

3. Aisha Ahmad, “The Security Bazaar: Business Interests and Islamist Power in Civil War Somalia,” pp. 89-117.

4. Jaganath Sankaran, “Pakistan's Battlefield Nuclear Policy: A Risky Solution to an Exaggerated Threat,” pp. 118-151.

5. Llewelyn Hughes, Austin Long, "Is There an Oil Weapon?: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pp. 152-189.

6. Raymond Kuo, Dominic D.P. Johnson, Monica Duffy Toft, "Correspondence: Evolution and Territorial Conflict," pp. 190-201.

7. Anit Mukherjee, George Perkovich, Gaurav Kampani, "Correspondence: Secrecy,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Indi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pp. 202-214.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4***

1.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647-659.

2. Jørgen Møller, "Why Europe Avoided Hegemon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660-670.

3. Ty Solomon, "Time and Subjectivity in World Politics," pp. 671-681.

4. Calvert W. Jones, "Explor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ward a Theory of Enlightened Nationalism," pp. 682-705.

5. Julian Germann, "Germa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pp. 706-716.

6. Wolfgang Wagner and Michal Onderco, "Accommodation or Confrontation?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Policies Toward Iran," pp. 717-728.

7. Ryan K. Beasley and Juliet Kaarbo, "Explaining Extremity i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pp. 729-740.

8. Patrick Shea, Terence K. Teo and Jack S. Levy, "Oppositio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rises: A Formal Model," pp. 741-751.

9. Jeffrey M. Chwieroth, "Fashions and Fads in Finance: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 Creation," pp. 752-763.

10. Michaël Aklin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The Global Spread of Environmental Ministries: Domestic-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pp. 764-780.

11.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Edward Richard Gol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Legal Transplantation: The Diffu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781-792.

12. Daniel Berliner and Aseem Prakash, "Public Authority and Private Rules: How Domestic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Shape the Adoption of Global Private Regimes," pp. 793-803.

13. Andrew Kerner,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p. 804-815.

14. Lawrence Ezrow and Timothy Hellwig, “Responding to Voters or Responding to Market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ublic Opinion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pp. 816-827.

15. Benjamin Nyblade and Angela O’Mahony, “Playing with Fire: Pre-Electoral Fiscal Manipulation and the Risk of a Speculative Attack,” pp. 828-838.

16. Rob Kevlihan, Karl DeRouen Jr and Glen Biglaiser, “Is US Humanitarian Aid Based Primarily on Need or Self-Interest?,” pp. 839-854.

17. Dursun Peksen, Timothy M. Peterson and A. Cooper Drury, “Media-driven Humanitarianism? News Media Coverage of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pp. 855-866.

18. Askar Akaev and Vladimir Pant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Future Shif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67-872.

19. Bear F. Braumoeller,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pp. 873-87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9, No. 3***

1. Esther Hauk and Hannes Mueller, “Cultural Leaders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p. 367-400.

2. Victor Asal, Paul Gill, R. Karl Rethemeyer, and John Horgan, “Killing Range: Explaining Lethality Variance within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pp. 401-427.

3. Jacqueline H. R. DeMeritt, “Delegating Death: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Government Killing,” pp. 428-454.

4. Bridget L. Coggins, “Does State Failure Cause Terror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 (1999–2008),” pp. 455-483.

5. T. Camber Warren and Kevin K. Troy, “Explaining Violent Intra-Ethnic Conflict: Group Fragmentation in the Shadow of State Power,” pp. 484-509.

6. Andrew W. Bausch, “The Geography of Ethnocentrism,” pp. 510-527.

7. David A. Jaeger, Esteban F. Klor, Sami H. Miaari, and M. Daniele Paserman, “Can Militants Use Violence to Win Public Support? Evidence from the Second Intifada,” pp. 528-54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2, No. 1***

1. Ilene Grabel & Kevin P. Gallagher, “Capital control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 introduction’,” pp. 1-6.

2. Ilene Grabel, “The rebranding of capital controls in an era of productive incoherence,” pp. 7-43.

3. Jeffrey M. Chwieroth, “Managing and transforming policy stigma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Emerging markets and controlling capital inflows after the crisis,” pp. 44-76.

4. Kevin P. Gallagher, “Countervailing monetary power: Re-regulating capital flows in Brazil and South Korea,” pp. 77-102.

5. Silla Sigurgeirsdóttir & Robert H. Wade, “From control by capital to control of capital: Iceland's boom and bust, and the IMF's unorthodox rescue package,” pp. 103-133.

6. Manuela Moschella, “Currency wars in the advanced world: Resisting appreciation at a time of change in central banking monetary consensus,” pp. 134-161.

7. Justin V. Hastings,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North Korean drug trafficking networks,” pp. 162-193.

8. Donna Lee, Mark Hampton & Julia Jeyachey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ecarious work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pp. 194-223.

#### ***Security Studies, Vol. 23, No. 4***

1. Andrew Bennett, Colin Elman & John M. Owen, “Security Studies, Security Studie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 pp. 657-662.

2. Andrew Moravcsik, “Trust, but Verify: The Transparency Revolution and Qualit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63-688.

3. Elizabeth N. Saunders, “Transparency without Tears: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parent Security Studies Research,” pp. 689-698.

4. Diana Kapiszewski & Dessislava Kirilova, “Transparency in Qualitative Security Studies Research: Standards,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pp. 699-707.

5. Jack Snyder, “Active Citation: In Search of Smoking Guns or Meaningful Context?,” pp. 708-714.

6. Mark L. Haas, “Ideological Polarity and Balancing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715-753.

7. Harris Mylonas & Nadav G. Shelef, “Which Land Is Our Land? Domestic Politics

and Change in the Territorial Claims of Stateless Nationalist Movements,” pp. 754-786.

8. Nina Kollars, “Military Innovation’s Dialectic: Gun Trucks and Rapid Acquisition,” pp. 787-813.

9. Mira Rapp Hooper, “Ambivalent Albion, Ambitious Ally: Britain’s Decision for No Separate Peace in 1914,” pp. 814-844.

***World Politics, Vol. 67, No. 1***

1. Jessica Gottlieb, “The Logic of Party Collusion in a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Mali,” pp. 1-36.

2. Caroline A. Hartzell and Matthew Hoddie,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Power Sharing and Post—Civil War Democracy,” pp. 37-71.

3. Paul Poast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Ho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pport Democratization: Preventing Authoritarian Reversals or Promoting consolidation?,” pp. 72-113.

4. Margaret E. Peters, “Open Trade, Closed Borders Immig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pp. 114-154.

5. Jonathan Kirshner, “The Economic Sins of Modern IR Theory and the Classical Realist Alternative,” pp. 155-183.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1***

1. Tom Lundborg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New Materialism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adical intertextual approach,” pp. 3-25.

2.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the ‘everyday’: beyond the paradox of ‘liberal peace’,” pp. 27-48.

3. Suthakaran Nadarajah and David Rampton, “The limits of hybridity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 peace,” pp. 49-72.

4. Mandy Turner, “Peacebuilding as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pp. 73-98.

5. Luara Ferracioli, “Immigration,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brain drain,” pp. 99-115.

6. Ryder McKeown, “Legal asymmetries in asymmetric war,” pp. 117-138.

7. Vicki Squire, “Reshaping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materialist challenge,” pp. 139-159.

8. Douglas Howland, “An alternative mod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un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161-183.

9. Gadi Heimann,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 great power? The story of France joining the Big Five,” pp. 185-206.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8, No. 1***

1. Chih-yu Shih and Chiung-chiu Huang, “Editor's Choice: China's Quest for Grand Strategy: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or Relational Security?,” pp. 1-26.

2. Dustin Tingley, Christopher Xu, Adam Chilton, and Helen V. Mil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ward FDI: Opposition to Chine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p. 27-57.

3. Scott W. Harold, “Opportunistic Cooperation under Constraints: Non-Proliferation, Energy Trade,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olicy towards Iran,” pp. 59-88.

4. Huang Yuxing, “A Structural Theory of Multilateral Asymmetric Strategies: China's Strategies towards its Neighbours before 1982,” pp. 89-113.

[整理: 宁鹏举、郭超、刘志]

[责任编辑: 刘志]



视它的存在感。此外，作为南开学子，看到杂志中大半篇幅有关校园内的国关活动报道，熟悉却没有新意。

希望《新视界》杂志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好。

**热心读者：**我一直对系刊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刚刚进校的时候，记得当时系刊的主编吕海学长说我们的系刊是全国高校国关专业少有的学生自办的刊物，顿时就心生

一种“原来我们学校国际关系专业也很牛，你看我们有系刊哎”的自豪感，也对系刊产生了一种雏鸟般的依赖。到现在大二了，一期一期也看了很多，系刊可以说我真正了解国际关系专业的桥梁，课本中的研究和大师在系刊里变成了真实的、可读的文章，让我认识到了学术研究的真实状态，也深感这条路的不易。所以希望系刊能一直走下去，为更多的国关学生提供这样的自豪感，以及通往国际关系的世界大门。

### 小编总结

非常感谢几位同学的来信，你们的支持和关注正是《新视界》不断发展的动力。作为学生自办的刊物，《新视界》一直致力于为同学们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小编希望能够在系刊上更多地看到大家的文字，将你们的建议传递给我们，也将你

们的感想和体会分享给更多的人。在未来的路上，希望《新视界》能够一直陪伴你们，愿你们有更多的收获。新年将近，也希望各位读者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业有成，生活顺利。

《新视界》信箱：

把你想对我们说得话，对我们改善栏目的建议，以及希望得到我们解答的疑惑，发给我们吧！来信请发：[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我们将尽可能迅速和详细地回答你的提问。

[整理：李安琪、李天翼、彭宁楠]

[责任编辑：李天翼]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 一、总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 二、中文注释

###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1 页。

2. 编著: 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68 页。

3. 译著: 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 在文献名之后, 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 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 如为三人以上, 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9 页。

###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著者, 文章题目(加书名号), 文集编者名称,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 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9-117 页。

##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 (三) 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101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 (二) 转引

####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年11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2月10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2月14日)。

##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2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10000字以内为宜。

###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并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